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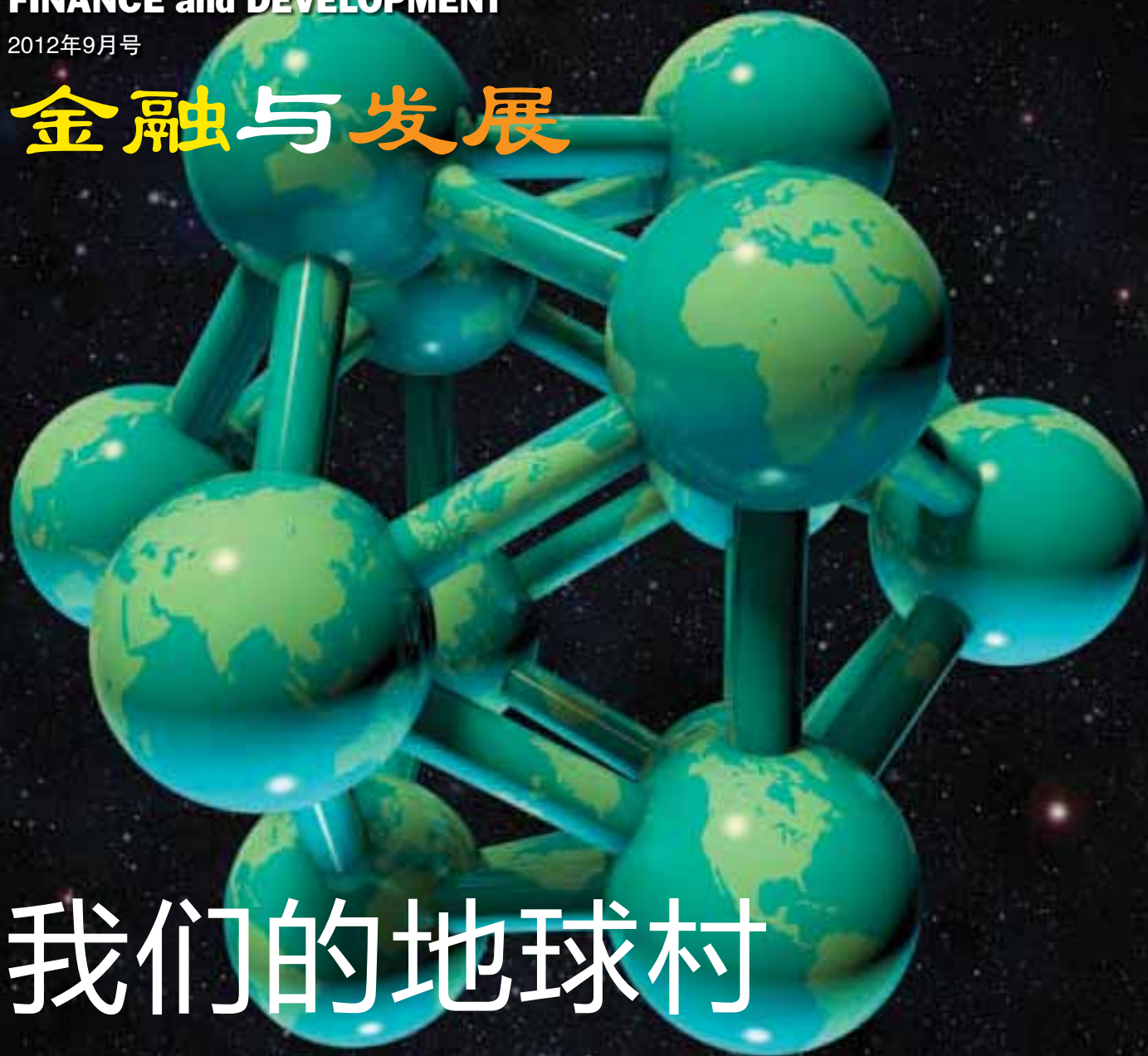
2012年9月号

# 金融与发展

凯莫尔·德尔维什  
论全球互联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直言不讳

河合正弘与隆巴迪  
论金融区域主义



# 我们的地球村



Jeremy Clift

主编

Marina Primorac

执行编辑

Camilla Andersen

James L. Rowe, Jr.

Hyun-Sung Khang

Simon Willson

Natalie Ramirez-Djumena

高级编辑

Glenn Gottselig

网络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Jacqueline Deslauriers

Maureen Burke

Lika Gueye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制/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媒体经理

Harris Qureshi

编务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Seemeen Hashem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as Bakker

James Gordon

Nicoletta Batini

Thomas Helbling

Helge Berger

Laura Kodres

Tim Callen

Paolo Mauro

Paul Cashi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drienne Cheasty

Paul Mills

Alfredo Cuevas

Martin Muhleisen

Marcello Estevão

Uma Ramakrishnan

Domenico Fanizza

Abdelhak Senhadji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 版权所有，IMF 2012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5 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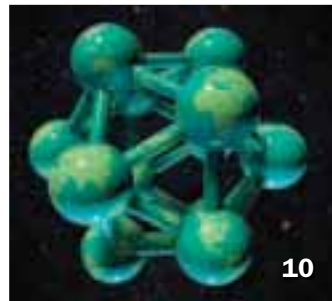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 特辑

### 全球联接

- 8 **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  
互联性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马凯硕
- 10 **世界经济：趋同、相互依存与分化**  
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越来越少，但在短期内他们仍将共舞  
凯莫尔·德尔维什
- 15 **深陷于网络之中**  
网络分析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带来的相关风险  
卡梅利娅·米诺
- 18 **当移民遭遇增长缓慢**  
随着经济危机在发达经济体中继续蔓延，全球性劳工流动将发生改变  
迪米特里斯·帕帕德米特里欧
- 23 **金融区域主义**  
区域协议正在重新塑造国际金融格局并帮助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河合正弘、多梅科·隆巴迪
- 26 **直言不讳：分割风险**  
必须通过增强有助于确保金融稳定性的国际体系来保障全球化带来的效益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 相互联接的亚洲

- 28 **中国式消费**  
中国需进一步促进家庭消费，确保增长更具包容性  
史蒂文·巴奈特、安拉·密尔维达、马尔哈·纳巴
- 32 **聚焦变化**  
中国的对外顺差正在减小，并影响其亚洲贸易伙伴  
马尔哈·纳巴、奥拉夫·恩特罗博拉斯特尔
- 36 **虎与龙**  
在发展进程中，印度与中国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  
穆尔塔扎·赛义德、邬杰明
- 40 **重返世界经济**  
缅甸重返世界经济，承诺改善民众的生活  
梅拉尔·卡拉苏鲁、谢尔盖·多措钦



### 本期还有

- 44 **金融业税收**  
很多欧洲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扩大对金融业的税收  
杰夫·戈特利布、格雷戈里奥·因帕维多、安娜·伊万诺瓦

## 全球化世界的多边主义解决方案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连接的世界，这有助于思想、信息和技术得到更为快速的传播。全球化经济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的资本和贸易流网络，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成果，使得全世界众多人口摆脱了贫困。

不过，正如我们从持续时间很长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我们彼此间的相互连接性既存在巨大的风险，也有很大的好处。即时通信存在受到外来思想、信息和技术快速侵袭的风险。因此，公众十分关注能否确保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一系列相互协调的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以及为应对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协调一致的国际监管体系的支持。

本期《金融与发展》将从不同层面分析这种相互关联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即将出版的《大融合：亚洲、西方国家及一个世界的逻辑》(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一书的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他所称作的“地球村”日益要求针对气候变化等重大新兴问题采取全球性解决办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任署长、现任布鲁金斯研究

所副所长德尔维什(Kemal Dervis)分析了导致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出现重大调整的全球经济三大基本转变。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多极化和相互依存，要求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直言不讳”栏目中,IMF 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 IMF 在确立全球金融风险以及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方面正取得进展,但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各国决策者采取一个全球性的视角。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以及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多米尼克·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分析了有助于支撑全球金融稳定性的一系列不断增多的地区性金融安排。

此外,我们采访了林毅夫。他是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反思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同时,我们还分析了缅甸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并剖析了如何扩大欧洲金融业税收范围的提议。

杰里米·克里夫特(Jeremy Clift)

主编

- 48 燃油风险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能源补贴会令其财务状况面临很大风险  
大卫·考迪、瓦伦蒂娜·弗拉米尼、马蒂亚斯·安东尼奥
- 50 井然有序  
将数据表拼图中的“遗失部分”连接上将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危机  
艾迪尔海德·伯基-施梅尔茨、阿尔弗雷德·M. 莱昂内

### 其他内容

- 2 简讯
- 4 经济学人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金融与发展》对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采访
- 42 图表释义  
获取银行服务  
最新的数据库资料表明，人们在存款、借贷、支付和风险管理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口  
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莱奥拉·克拉佩尔
- 52 返归基础  
什么是货币？  
没有货币，现代经济就无法运转  
伊雷娜·艾斯门德逊、希达·欧纳

- 54 书评  
《知难而进的改革：来自尼日利亚的经验教训》，恩戈齐·奥孔约·伊韦拉  
《俄罗斯：长远的眼光》，叶戈尔·盖达尔  
《复式记账法：威尼斯商人如何创建现代金融》，简·格里森-怀特
- 57 数字聚焦  
追踪财政规则的运用  
针对危机的财政遗留问题，数额限制应运而生  
安德烈·沙赫特、尼娜·卜迪娜

插图：封面和第10页，Randy Lyhus；第44页，Seemeen Hashem/IMF。

摄影：第2页，Radius Images/Corbis；ROM Image Broker/Newscom；第3页，Strauss/Curtis/Corbis，Kike Calvo/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Corbis；第4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8—9页，Jose Fuste Raga/Corbis；第15页，Erich Kuchling/Westend61/Newscom；第18页，Piotr Malecki/Panos；第21页，Mike Blake/Reuters/Newscom；第23页，Imaginechina/Corbis；第26页，Stephen Jaffe/IMF；第28页，Mads Nissen/Panos；第32页，Justin Jin/Panos；第36页，imago stock&people/Newscom；第40页，Sergey Maximishin/Panos；第43页，iStock，Philippe Lissac/Godong/Corbis；第48页，Associated Press；第52页，Eugene Salazar/IMF。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http://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http://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 重于 GDP 的增长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有关经济增长的标准评估指标忽略了自然资源快速枯竭的现象，而这将会对子孙后代带来严重危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12 年包容性财富报告》(Inclusive Wealth Report 2012) 推出了一项新的评估指标——“包容性财富指数”，该指数在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类发展指数等评估指标之外，将各种资产，如制造、人力和自然资本纳入其中。报告指出，该指数向各国政府表明了



日本的树木和竹林。

本国的财富及其增长可持续性的真实状况。

该报告分析了 1990—2008 年期间全球 20 个国家包容性财富的变化状况。这 20 个国家的 GDP 占全球 GDP 总值近 3/4。在此期间，南非人均自然资源数量减少了 33%，巴西减少了 25%，美国减少了 20%，中国减少了 17%。仅有日本人均自然资本数量未出现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其森林覆盖有所增长。

按 GDP 核算，1990—2008 年期间，中国、美国、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422%、37%、31% 和 24%。

但是，如果按照新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来评估的话，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45% 和 18%，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13%，而南非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下降了 1%。

## 预计今后痴呆症患者的数量将增长两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的痴呆症患者数量接近 3560 万。预计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一倍，增至 6570 万，2050 年将增加两倍，达到 1.154 亿。痴呆症患者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超过一半 (58%) 的痴呆症患者位于低中收入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痴呆症：公共卫生的优先领域》(Dementia: A Public Health Priority) 预测，预计到 2050 年中低收入国家痴呆症患者占全球痴呆症患者的比例可能增至 70% 以上。

全球痴呆症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成本每年超过 6040 亿美元。这些成本包括提供医疗成本和社会护理成本，以及痴呆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收入减少或丧失带来的成本。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仅有八个国家制定了应对痴呆症的国家计划。

## 堵住漏水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简称“亚行”) 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漏水被堵住并对水厂进行改革，亚太地区的数百万人口将能获得清洁用水。

亚行主管知识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事务的副行长宾度·罗哈尼 (Bindu Lohani) 表示：“在亚太地区日益面临严重水危机的同时，很多地方由于漏水和低效用水导致水资源不合理的流失。如果将流失的水量减少一半，该



地区的 1.5 亿人将能够获得经过处理的清洁用水。”

亚行估计，每年亚太地区流失的水量达到 290 亿立方米——足以注满 1100 万个奥运会游泳池，从而导致亚洲地区的水厂每年减少 90 多亿美元的收入。

## 2012 年大记事

9 月 1—7 日，意大利那不勒斯  
联合国世界城市论坛

9 月 8—9 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10 月 9—14 日，日本东京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

10 月 16—19 日，印度新德里  
经合组织世界统计、知识和政策论坛

11 月 8—9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IMF 第 13 届雅克·波拉克研究年会

11 月 12—14 日，阿联酋迪拜  
2012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事务峰会

## 电子医疗革命

目前，由于手机使用量在非洲的高速增长，该地区出现了电子医疗(电子通信支持的医疗保健服务)革命。目前非洲的手机用户数为2.81亿，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手机市场。该地区的互联网使用量仍然相对较低，但预计将出现快速的增长。

非洲开发银行指出，非洲地区电子医疗的增长正在促进该地区医疗卫生行业的受重视程度、责任感和良好治理。例如，在加纳北部地区，“移动助产士项目”(Mobile Midwife Project)一直为妇女在怀孕期间提供医疗信息，并鼓励她们通过短信或语音信息寻求产前护理服务。这些重要医疗信息的方便获取，使非洲地区的孕妇得以掌控自己的健康状况。

目前，电子医疗已成为非洲地区医疗卫生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2011年，肯尼亚成为该地区首个制定全国性电子医疗战略的国家。开创性的手机银行系统M-PESA便诞生于肯尼亚。



正在使用手机的带孩子的恩德贝勒妇女。

## 为可持续交通提供支持



哥伦比亚麦德林乘坐地铁的青少年。

泛美开发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四家组织宣布将大力致力于可持续交通。上述八家多边开发银行在今年6月承诺，未来十年间他们将投资1750亿美元用于为更多的可持续交通系统提供融资，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包容性经济发展。

泛美开发银行指出，每年全球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交通事故以及控制气候变化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占全球GDP的5%—10%。由于过去数十年间，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主要侧重于改善汽车驾乘者的出行便利性，而非公共交通方式、自行车和步行者的出行便利性，使得交通行业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这种规划方法使得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贫困人口出行变得更为艰难。

## 悲观科学？



在我们的播客上聆听对有关顶级  
经济学专家及经济决策的采访：  
[www.imf.org/podcasts](http://www.imf.org/podcasts)。

#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金融与发展》对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采访

在今年早些时候为林毅夫结束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期所举办的招待会上，按照惯例，在这种场合下，他的终生成就再次被人们提起：林毅夫，在其所在的年代第一个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林毅夫，在北京拥有私家车的第二位公民；林毅夫，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首席经济学家。

这些里程碑式事件体现了他最为可贵的个人品质：果断、灵活和实际。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一位同事借用非洲的一句谚语形容他——林毅夫拥有可以“煮石”（cook a stone）般的毅力。

如果一个人有资格被称为是“在适宜的地点，适宜的时间，适宜的人选”，那么这个人非林毅夫莫属。他的经历丰富：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推出一系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市场改革后（这对林毅夫而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便来到了中国大陆。此后，一个偶然的机，恰逢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大陆急需一名翻译，林毅夫凭借其出色的英文水平赢得好评，最终该名经济学家承诺向其提供奖学金，并推荐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6月，在全球进入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前，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世界银行的运营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林毅夫被挑选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担任该要职的第一人。历史再次垂青于花甲之年的林毅夫。



## 反思发展

四年弹指一挥间，林毅夫即将结束其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的任期，返回中国。在此期间，他也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这位性格内敛、戴着眼镜的经济学家以一种不事张扬的成就感，回顾了其职业生涯中最近跌宕起伏的一段时期。世界银行为林毅夫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使其得以推动他用于反思发展的经济分析框架，即他所称为的“新结构经济学”（见专栏）。

“我为人们打开了思考之门，也为我的同事们打开了思辨之门”林毅夫说。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林毅夫认为自己与传统上主宰发展经济学的西方决策圈处于半独立状态。而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步随着前任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后尘。不过，他的理论是对“华盛顿共识”直接的尖锐的批判。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与此前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机构（包括IMF、美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等）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当被问及他是否确实是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时，林毅夫回答说：“我不仅是（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世界银行第一位）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了解的（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合著者、其在世界银行的同事塞勒斯丹·蒙卡（Célestin Monga）认为，林毅夫是“世界银行所有首席经济学家中第一个真正帮助世界6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首席经济学家。你还需要其他什么证据吗？”

斯蒂格利茨表示，林毅夫在把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东亚地区的增长经验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模范军官

林毅夫出生卑微，他于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共有六个兄弟姐妹。这一点可能使其有别于他的前任。不过毫无疑问，他是世界银行唯一一位背负通缉令的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时年26岁，原名林正义的林毅夫还是驻扎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金门岛的台湾军队一名模范军官。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游过2000多米宽的海峡来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大陆地区，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他失去踪影后，台湾当局宣布其“失踪”，并向他妻子发放了相当于3万多美元的补偿金。不过此后，台湾当局指控他犯有叛逃罪。

专栏

## 何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来研究经济结构是如何影响发展进程的一种理论。

林毅夫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或人力和物理资本）决定的内在优势和有利条件所形成的产物。按照林毅夫的说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是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内在表现形式。”

林毅夫建议，为更好地推动发展，一国应专注于其基于现有条件（即所拥有的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国能够表现相对较好的产业）。这样，该国将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拥有最大的投资回报，最多的储蓄，并为以最快的方式升级至资本密集型产业奠定基础。成功造就更大的成功，林毅夫这样表示。

如同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的理论框架指出，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政府的任务是通过解决外部因素和协调问题，帮助企业实现产业升级。不过，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在于，它还主张通过针对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特定产业提供支持，战略性地利用政府的有限资源。这使得各国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实现更快的腾飞。

当被问及当初为何作出这一决定时，这位经济学家拒绝了进一步的询问——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唯一一次他的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林正义撇下了三岁的儿子以及身怀六甲的妻子陈云英，只身来到中国大陆。当被问及妻子对其“叛逃”的反应时，林毅夫答道：“她支持我。她认为，只要我幸福，她就幸福。”“你提前告诉你妻子你要离开（台湾）吗？”“我向她暗示过。”

## 转型之中的中国

到达中国大陆后，林正义改名为林毅夫，意为“士不可不弘毅”。由于不能直接与家人取得联系，林毅夫给居住在日本东京的表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诉说了自己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妻儿的思念之情。除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包括要求他的表哥利用林毅夫不为外人知晓的昵称，代表他给家人寄送圣诞礼物）外，林毅夫重点描述了中国的发展正处于重要关头——因为当时中国正寻求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审视建国30年来的情况，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迈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他在信中写道。

在摆脱不发达和普遍存在的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飞跃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其他国家）是林毅夫有关发展论点的主要典范。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见专栏）中，林毅夫认为，针对不发达国家的对策可以简要概括为“最好地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资源”。

## 斯蒂格利茨表示，林毅夫在利用发展经济理论总结东亚地区的增长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新发展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为促进结构性转型，政府的支持特定产业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挑选胜者和败者”或者称之为产业政策，这一政策曾经历了一段兴衰沉浮的历史，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又开始再度流行起来。

至今，主流的批判声音仍然认为，政府不完善的判断和扭曲的利益取代了市场本身客观明智的决策。例如，日本广受赞誉的通商产业省就曾反对日本国内汽车制造商的出口计划，并极力阻止本田从摩托车市场转向轿车市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不希望看到轿车行业再新增一家公司。

林毅夫认为，为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成功的秘诀就是政府必须确定适宜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相关行业。他以智利为例指出，在政府的支持下，智利就从矿产、林业、渔业和农业等基础产业转向炼铝、鲑鱼养殖和制酒等行业。林毅夫指出，过去产业政策往往失灵，是因为政府极力强制推行那些不适宜于本国禀赋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背离”了其比较优势。

林毅夫将他的理论框架取名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该理论具有结构主义经济学——林毅夫称之为第一波发展思潮——的渊源。结构主义经济学于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拉美，提倡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发展。不过，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尚塔亚纳恩·德瓦拉贾（Shantayanan Devarajan）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起源更接近于本土以及最近时期。

今年早些时候，在庆祝林毅夫介绍其最新理论的新书发布研讨会上，德瓦拉贾用一串富有挑衅性的话率先发难：“当我看到‘新结构经济学’的题目时，我就想起了当初伏尔泰有关‘神圣罗马帝国’的一段话，‘那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因此，我要求林毅夫给我们解释解释，让我们确信这是新的，结构性的经济学。”

德瓦拉贾对林毅夫的理论原创性持怀疑态度。他此后告诉我说，林毅夫的理论是“典型地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发展的理论。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除非市场失灵，如外部因素，否则市场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存在外部因素，则政府应该进行干预，来修补这一外部因素。”

林毅夫在感谢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他坚持认为，他对政府赋予的关键重大作用使其理论明显不同。如果将“华盛顿共识”称之为第二波发展思潮，他认为他的理论是第三波发展思潮，或者是“发展思维3.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达杜什（Uri Dadush）说：“林毅夫的理论挑战了经济学的传统理论。”

在其新书《繁荣的求索》（The Quest for Prosperity）中，林毅夫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并反思了过去四年间在世界银行所汲取到的经验教训。通过该理论框架，林毅夫阐述了即便最贫困国家也可以快速发展数十年，显著减轻贫困状况，并在一至两代人的时期成为中等乃至高收入国家。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说：“林毅夫敢于预测世界贫困将会终结。”

## 比较优势的问题

林毅夫的部分箴言似乎具有迷惑性。各个国家应该发挥其优势，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不过，鉴于他的指导方针是各国应主要关注其根本的比较优势，考虑到韩国在钢铁和煤炭等原材料的国内供应量有限以及缺乏对造船工业的了解，他会建议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造船工业吗？其他部分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然而，这正是韩国发展成功的秘诀。

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说：“考虑到要素累积和技术能力建设过程的性质，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如果不背离其比较优势，在拥有‘适宜的’要素禀赋前实质性地进入新的产业，是不可能积累在新产业方面的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在林毅夫理论框架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许并不足为奇：他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他得以在芝加哥大学这个自由市场思想的大本营求学，也再次印证了他一生之中幸运之神的多次眷顾。在他到达中国大陆的一年间，凭借其在台湾所奠定的扎实英文功底，林毅夫被聘为来华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翻译。舒尔茨当年因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舒尔茨对林毅夫这位年轻有为的翻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执教后，舒尔



茨立即提出为年轻的林毅夫提供奖学金，让他到芝加哥大学求学。

“在得到这一诱人的机会之前，你和舒尔茨这位顶级经济学家呆了多长时间？”我问他。“只有一天”，林毅夫回答，“不过我这个翻译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笑容一如既往。舒尔茨以善于慧眼识英才而闻名，曾担任过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和美国经济学会前任会长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等人的导师。

在进入芝加哥大学后，年轻的林毅夫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的妻子陈云英和一双儿女也来到美国和他团聚。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又来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后，同期他的妻子也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

## 成果丰硕的职业生涯

1987年，当林毅夫举家回到北京时，中国尚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时期。当时中国正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众多国有企业被切分为小型私有企业，农业去集体化，多个经济特区纷纷建立，在此背景下，林毅夫开始了自己成果丰硕的职业生涯。在加入世界银行之前，他已经著有18本书，并发表了众多论文。

1994年，林毅夫帮助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其宗旨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当时，中国非常渴望了解到有关如何利用其经济潜力的知识。该中心在决定中国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

## 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一职是由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任命的，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有关发展政策的发言人，以及世界银行研究、前景（全球监测和预测）和数据部门的负责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负责率领接近300名经济学家、统计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开展减贫和推动全球发展的工作。

他以工作勤奋和精明能干而闻名。他的一位同事蒙加（Monga）说：“他总是精神饱满”。蒙加曾多次与林毅夫一同出差。他说，林毅夫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不是去参加社交活动，而是继续工作至深夜。“工作是林毅夫的全部。”

毫无疑问，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本身并非没有挑战。林毅夫曾遭遇到来自内部的对他观点的反对意见，这

些强烈的反对意见常常来自于他所管理的研究部门。林毅夫说，他会认真倾听这些不同的意见。不过世界银行的部分员工说，林毅夫通常会尽量避免与他们直接发生冲突。世界银行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说：“（林毅夫）他不试图以任何方式去改变别人的不同意见。他只是将自己撇开，我认为这样收效并不大。”

为确保他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对世界银行产生影响，林毅夫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研究非洲的产业化问题。林毅夫认为，非洲地区增长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认为，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完成产业升级，告别低技能制造业，这将为非洲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进入这些行业创造新的机会。林毅夫说：“这将为非洲地区的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创造可以利用的巨大就业机会。”不过，非洲国家必须为这种产业转移做好规划。

世界银行代表非洲21国的执行董事哈桑·塔哈（Hassan Taha）认为，林毅夫“鼓励思想的革新”，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减贫方面的挑战。

## 重返中国

目前，林毅夫已回到北京，继续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执教。在向世界银行为其提供首席经济学家这一机会表示感谢的同时，林毅夫说，在华盛顿对全球发展情况有了总体认识后，他急切盼望回到中国。他在个人情感和职业上对中国的喜爱，不允许他长时间地与中国分离。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唯有一个还是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在他结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任期之前几周内，在由全球发展中心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毅夫透露，他仍然心怀一个“梦想”，就是盼望能够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台湾，去祭祀他的先祖，拜访亲朋好友。

2002年，在父亲去世后，林毅夫申请回台湾奔丧。台湾当局同意了他的申请，然而台湾军方签署了叛逃逮捕令——这一逮捕令至今仍未取消。最终，由他的妻子代表他回台湾奔丧——这对于一名亚洲后裔来说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林毅夫始终认为，台湾岛将最终与大陆实现统一。迄今为止，林毅夫的支持者呼吁取消他的逮捕令的请求一直未受到重视。今年早些时候，台湾“国防部部长”高华柱在回答“立法院”的询问时告诉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如果林毅夫返台不面临指控，他将辞职以示抗议。高柱华碰巧是林毅夫的营长和要好的朋友。林毅夫对此回应道，他可以等待。

林毅夫广为人知的毅力还将暂时经受更长时间的考验。■

# 地球村时代

马凯硕

近日，人类悄无声息地跨越了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如今，全球的电话数量首次超过人口的数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一部电话，其中部分人拥有两至三部电话。1990年，全球仅有1100万人拥有手机。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56亿部，而固定电话的数量为13.2亿部——同时世界人口的数量接近70亿人。此外，我们可以通过Skype等互联网电话服务，以几乎免费的形式拨打世界各地的电话。这种高电话密度意味着世界人口已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相互联系在了一起。

科技正带来全球的融合。全球手机及不久后智能手机数量的快速增长将把互联网及其传输的信息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在非洲和印度偏远的农村地区，已经通过小型太阳能电池和小型电脑实现了这一点。同时，信息“大爆炸”（以及教育）正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免疫接种，在1970—2006年期间，世界接种抗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疫苗（DPT）的婴幼儿比例从1/5上升至近4/5。其他一些有助于拯救生命的理念，如饭前洗手，或者不在农田里排便等，也在世界各地得到传播并日益获得人们

的认可（Kenny，2011年）。这种互联性可以拯救生命。

同样，科技也使人们能够更多地出国旅行。1950年，全球仅有2500万人出国旅行。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6亿。也就是说，地球上1/5的人口将实现出国旅行的梦想——而这一联系程度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然而，科技并非是推动这一深层次互联的唯一推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经济体。因此，当体量很小的希腊经济可能崩盘时，整个世界经济都将受到影响——希腊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可以让美国和中国等大经济体同样崩溃。当一个重大的全球性事件爆发时，全球股市将同步涨跌。全球化的供应链意味着，当一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时，其他国家的工厂也将受到影响。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中。

全球变暖也向我们明确地传达了世界陆地面积不断缩小的这一信息。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这些证据，如北极的冰雪融化以及各种反常的天气状况，这些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确实存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同样，当一

# 已经到来

## 互联性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个患有流感的乘客登机时，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也可能很快感染上这一疾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努力拯救地球村。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伦理观，以此提醒我们世界 70 亿人口的生命现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牛津哲学家大卫·罗丹 (David Rodin) 认为：“由于必须应对各种日益全球化的迫切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伦理观” (Rodin, 2012 年)。对此我表示赞同。

有意思的是，科技本身是一种物质要素，但同时也在推动世界各地人们精神上的相互联系。当智利 33 名矿工被困地下长达 69 天期间，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们祈祷。而当乌干达的游击队首领约瑟夫·科尼 (Joseph Kony) 被控在数十年间屠杀和残害数千名平民，并被予以驱逐孤立、削弱势力时，有关他的一部视频在网上以病毒式的方式疯传，并成为有史以来观看次数最多的一部视频。仅仅六天时间，该视频的观看次数就超过了 1 亿人次，绝大部分人是通过 YouTube 观看的 (Aguilar, 2012 年)。2012 年 3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针对科尼的决议，共有 46 名联合发起人。发起人之一参议员林赛·格莱姆 (Lindsey Graham) 说：“当有 1 亿美国人在关注某件事的

时候，肯定就会引起我们的关注” (Wong, 2012 年)。

随着全球互联性的快速发展，信息和理念的传播意味着我们的道德规范也将超越国界。我们所有人都将超越自己的国界，成为祖国和全世界公民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当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地球村时，整个世界就将变得更加美好。■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即将出版的《大融合：亚洲、西方及一个世界的逻辑》(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 一书的作者。

参考文献：

Aguilar, Mario, 2012, “Kony 2012 Is the ‘Most Viral’ Video of All Time,” Gizmodo, March 12.

Kenny, Charles, 2011, “Getting Better in Picture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Essay, p. 25. [www.cgdev.org/content/publications/detail/1424862](http://www.cgdev.org/content/publications/detail/1424862)

Rodin, David, 2012, “Toward a Global Ethic,”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6, No. 1, pp. 33-42.

Wong, Scott, 2012, “Joseph Kony Captures Congress’ Attention,” Politico, March 22.

# 世界经济

# 趋同、相互 依存与分化

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越来越少，但在短期内他们仍将共舞

凯莫尔·德尔维什

大多数人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融合的全球化世界。但是回顾最近的历史，谁能清楚地说出这种融合的性质是什么？似乎有三大基本趋势在发挥作用，而这三大基本趋势则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特征。





### 三大基本趋势

第一大趋势是新的趋同。已故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爵士在1979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讲道：“在过去的百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一直取决于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发达国家增长快，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快；反之，发达国家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会放缓。那么，这种联动是不可避免的吗？”

最近的数据表明：这种联动仍然存在，但当前如何区分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变动是至关重要的。大约从1990年开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以可持续的方式加速增长，并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在世界经济动态中是一项重大的结构性转变。

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基本特征是周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过去的20年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趋势增长率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或“分离”，但这并没有导致该趋势的周期性变动发生脱钩。

新的趋同和强化的相互依存性同时存在于有关收入分配的第三大趋势中。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均等，尤其是高收入者所得的占比急剧上升。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已增加了近两倍，约占美国总收入的20%（Alvaredo等人，2012年）。同时，虽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两大集合体，两者之间的差距经过上述新的趋同已经缩小，但是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中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的收入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间几乎停滞不前（见“扩大还是缩小？”，《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

尽管平均收入趋于一致，但这两项事实使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 新的趋同

在1990年左右，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趋同时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人均收入平均增长方面远远超过发达经济体。自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以来，富国和穷国之间明显分化的这一特征现在正在减弱。关键的问题是，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新的趋同很可能持续并导致世界经济发生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

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带来了巨大分化（Maddison, 2007年）。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较富裕、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半球”国家与欠发达“南半球”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从3—4倍扩大到20倍以上（Milanovic, 2012年）。二战后，这种分化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而放缓，但在1950—1990年，相对平均收入差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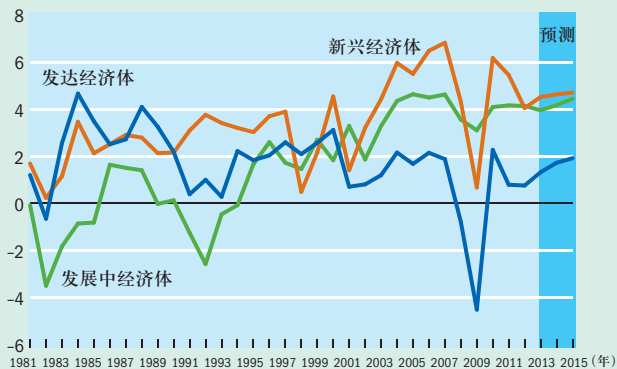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虽然1997—1998年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三倍。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然后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世纪之交加速增长（见图1）。

图2显示了使用一种统计技术——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过滤器——计算的基本趋势增长率，它将周期性波动从长期趋势剥离出去。从20世纪90年代

图1  
增长率和周期

在过去30年中，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显著增长，但也存在很强的周期性变动。

（人均GDP增长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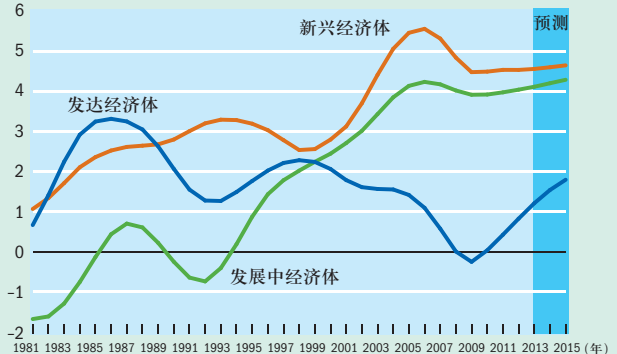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4月。

图2  
持续性的差异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处在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长期增长趋势中，尤其自世纪之交开始。

（人均趋势增长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2012年4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数据的计算。

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趋势增长率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中趋势增长率的脱钩是显而易见的。

三个方面的发展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释这种新的趋同。

首先，全球化——随着后来者引进并改进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并通过加强贸易联系和不断攀升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促进了追赶型增长。当然，改进技术要比发明技术容易得多。

其二，多数新兴市场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结构转型，伴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资本密集度增加而人均增长更快。同时，许多国家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最高峰，而由此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相对的是，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显著。

趋同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投资的比例较高——在过去10年间，其占GDP的比例为27.0%，而发达经济体为20.5%。投资不仅可以使可用资金增加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采用新知识和生产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资本和劳动力的联合生产力，推动了从农业等低生产率行业向制造业等高生产率行业转移，加快追赶型增长。这第三个因素——较高的投资率——在亚洲尤其重要，而在中国则最为典型，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在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亚洲的趋势增长率不仅出现得更早，而且增长幅度也更大。

这种趋同会继续吗？预测总是有风险的，而且在过去的20年中导致趋同的一些因素可能很快就失去了效力。针对制造业而言，其追赶型增长的大部分已经实现，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业的重新配置

也耗尽了其中一部分潜能；在一些国家中，虽然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很快，却没有创造多少就业，从而导致更大的劳动力份额从事着低生产率活动（Rodrik, 2011年）。

但是，我们所说的趋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趋同，而不是像有些分析那样，认为非常小的国家和中国、印度或者印尼等国家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总体上来说，至少在未来10—15年，更多追赶型增长的潜能仍然很大。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业的再配置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但在某些狭义子行业内，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公司向高生产率公司的再配置很可能以稳健的速度继续下去。服务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也可能有适应新技术的巨大潜力。除中国以外，在未来10年中，与“年老的”富裕国家相比，人口统计数据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更为有利。最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积累的极高负债率将限制其宏观经济政策，而投资也将放缓。

这种持续性的趋同，虽然速度上可能将会放缓，但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到2025—2030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大大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这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以及本国货币可能实际升值。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巴西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将比英国或法国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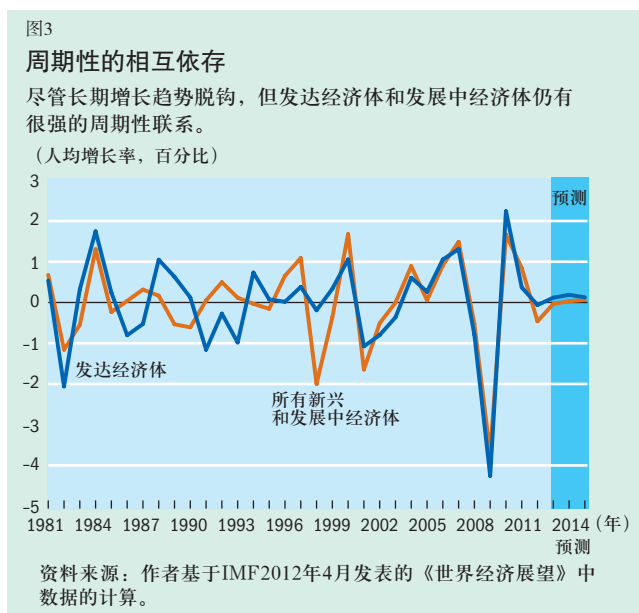
自工业革命开始的将世界刻板地划分成“发达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的方式将会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更加差异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经济。

## 周期性的相互依存

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开始的2007年年底和2008年年初，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看似飞速增长，且不受美国和欧洲的影响。随后便是2008年年底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带来的恐慌。全球经济显著放缓，甚至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这引发了人们的普遍担忧，认为这场始于华尔街的危机可能会导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崩溃。

全球经济的确在2009年放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增长率放缓至不到1%，而发达经济体则倒退了近4%。但前者迅速恢复增长，2010年增长率为6%而发达经济体为2.3%。在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能力导致了对各国不同命运的全新认识。

图2显示了两组不同的趋势增长率：前者的人均GDP增长率是发达经济体的2—3倍，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图3表明在这一趋势中周期并没有这样的分化。特别是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出现



了周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Kose 和 Prasad，2010 年；IMF，2010 年）。相互依存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像中国这样的大宗原料进口国的经济增长或衰退，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出口有直接的影响。

世界经济仍然是相互依存的，国家的经济周期跨越国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因素，如



到2025—2030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大大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这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以及本国货币可能实际升值。

长期的资本积累、技术的追赶和人口因素。但围绕着趋势的周期性变动，与短期需求方面的因素关系更为紧密，很可能密切相关。2012 年年初，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滑坡，更多是因为宏观经济和财政部门的管理问题，而不是长期供应方面的因素，这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周期性的相互依存似乎有三大主要渠道。

首先是贸易。由于贸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份额有所增加，因他国宏观经济发展而导致本国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有望增加。例如，一个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则通过减少对他国出口的需求而蔓延到其他国家。从理论上讲，如果贸易促使生产更加专业化，那么特定行业的冲击将趋于减少周期性的相互依存。但在实践中，宏观需求效应更为明显。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日益全球化、巨大而复杂的金融市场。一份新的 IMF 报告衡量了“溢出效应”（即在当今经济中，由于巨大的贸易额和金融联系而导致一国政策对他国产生的影响），并证明了金融渠道的重要性。以欧元区为例，该报告得出结论，“来自欧元区国家压力的直接（与贸易相关）溢出效应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压力是来自于对欧元区银行的稳健性的疑虑，那么溢出效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会很大，在许多情况下，会像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影响一样大”（IMF，2011 年）。该报告还发现，在因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或过度杠杆化等原因导致财务状况吃紧的情况下，长期债券收益率的相关性要高得多，这表明金融渠道的实力取决于世界金融市场的总体态势。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反映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条件的相似性——也能通过金融机构的盈利状况和信用条件来影响经济周

期的联动性（Claessens、Kose 和 Terrones，即将出版）。

最后，相互依存似乎还有第三个渠道，可能与第二个渠道紧密相关，但不那么有形，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心或者叫做“动物精神”，从而极大地影响金融市场和投资决策。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的新闻似乎仅仅通过散布“情绪”即可直接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违约掉期息差（Dooley 和 Hutchinson，2009 年）。

由于上述所有因素，长期增长趋势的脱钩与周期

性变动的持续相关共存，因为全球和区域因素将世界经济编织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 分配的分化

除了人均收入的广泛趋同和经济活动跨越国界的周期性相互依存以外，国家内部更严重的不平等以及世界最富有公民和最贫穷公民之间更大的差距似乎使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大，这是最新出现的第三大基本趋势。在许多国家，收入都集中在极少数的高收入人群手中。除了这种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演变外，一些非常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增长，所以无法参与到上述的广泛趋同之中。

当然，因快速追赶型增长而产生的趋同效应影响到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一个快速增长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但是，各种因素（比如技术变革的性质、技能溢价的提高、全球市场的大幅扩张、在许多市场上出现的相关的赢家通吃现象、资本频繁流动而劳动力却相对固定——特别是非技术性劳动力，以及工会影响力的下降）都导致在许多大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的高收入人群手中。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许多正在经历冲突和政府失灵，与 200 年前相比数亿人的实际收入并未得到大幅提高（Milanovic，2012 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经济有非常大的新的分化，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国家内部。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分配的两极差距已经扩大。

在许多国家里，收入最高的 1% 人口与其他人口

的巨大分化是新的现实。在美国和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所获收入占比增加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和印度，则不太明显。但从

## 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多极化、相互依存度更高。

现有的数据来看，这种收入高度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是否为真实的全球现象尚不清楚。世界高收入人口数据库（Alvaredo 等人，2012年）显示，截至2007年，至少欧洲大陆和日本没有发生收入转移到收入分配最高的人口手中。但是因为引起这种收入高度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全球性的，国家政策只能抵消部分影响，所以这种头重脚轻的集中现象很可能将会而且只能增加。例如在德国和荷兰等国家，高管薪酬在过去10年中的增长非常迅速（Fabbri 和 Marin，2012年）。而且欧元区的危机以及相应的紧缩政策可能会导致欧洲收入状况更加不平等，因为预算的限制而削减社会开支，同时由于资本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动性，难以有效地对最富有人群增税。

这种收入分配的新分化可能并不总是意味着国家分配的所有部分存在更严重的国民不平等性。然而，它确实代表了极少数人的收入集中性，并通过收入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力，这可能会导致收入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产生这种动态的因素（科技、财政、金融、政治等）仍在发挥作用。

## 为了日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进行合作

世界经济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大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国家之间越来越大的相互依存度，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及国家内部和世界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这几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些趋势对政治、社会和地缘政治产生着影响，并将决定未来的政策讨论。

第一，在国际机构的治理中必须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日趋重要性，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有赖于此。全球的相互依存性要求加强机构设置中的合作，在机构设置中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占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二，上述的全球经济周期以及IMF最近证明的溢出效应，要求出台相互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后，在收入分配中的潜在不稳定趋势需要类似的国际政策协作，否则单一国家的再分配政

策将难以实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税基和税率必须是统一的，尽量减少逃税的可能，移民政策的管理必须同时兼顾东道国和来源国的利益。最后，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仍然是道德和政治上的需要。

未来世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多极化和相互依存性，全球性的市场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潜能。这种潜能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如何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溢出效应，以及在分配经济增长成果时如何鼓励增进平衡性和公平性。■

凯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是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兼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

### 参考文献：

- Alvaredo, Facundo, Tony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accessed June 1, 2012. <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 Claessens, Stijn, M. Ayhan Kose, and Marco Terrones, 2011, "How Do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ycles Interact?" IMF Working Paper 11/8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Dooley, Michael, and Michael Hutchinson, 2009, "Transmission of the U.S. Subprime Crisis to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on the Decoupling-Recoupling Hypothesi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IMF/Warwick Conference, April 6.
- Fabbri, Francesca, and Dalia Marin, 2012, "What Explains the Rise in CEO Pay in Germany?"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757 (Munich: CESifo Group).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October).
- , 2011, "Consolidated Spillover Report: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ic-5" (Washington).
- Kose, M. Ayhan, and Eswar S. Prasad, 2010, *Emerging Markets: Resilience and Growth amid Global Turmoil*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ewis, Arthur, 1979, "The Slowing Down of the Engine of Growth," Nobel Prize lecture, Stockholm, December 8.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9/lewis-lecture.html](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9/lewis-lecture.html)
- Maddison, Angus, 2007,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AD*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anovic, Branko, 2012, "Global Inequality: From Class to Location, from Proletarians to Migrants," *Global Policy*, Vol. 3, No. 2, pp. 125-34.
- Rodrik, Dani, 2011,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11 Jackson Hole Symposium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August 2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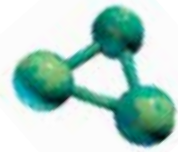




# 深陷于网络之中

网络分析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带来的相关风险

卡梅利娅·米诺



安德鲁·霍尔丹 (Andrew Haldane)，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执行董事，曾把 2008 年年底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比作病毒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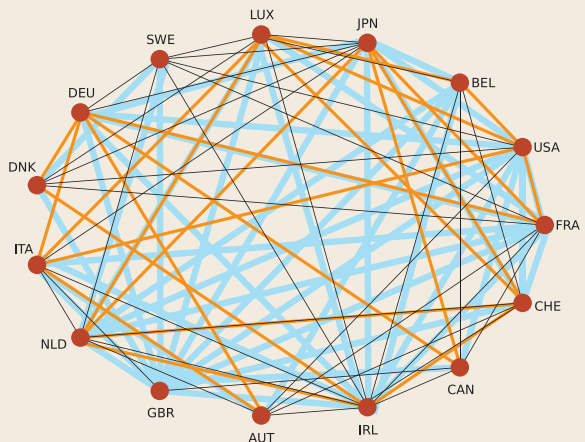
对雷曼兄弟倒闭可能会蔓延的担忧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导致一批金融市场冻结其借贷，这就像人们担心病毒传染而避免相互接触一样。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影响之下，很难独善其身。事实上，雷曼兄弟倒闭的影响和宏观经济成本要远远大于人们仅基于倒闭这一初始事件而作出的预测 (Haldane, 2009 年)。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使雷曼兄弟倒闭这样相对较小的冲击影响到较大的经济活动，以及为什么很难隔离这种冲击的影响。答案似乎在于代理、机构和国家间金融联系的复杂性。当意料之外的不利事件 (用经济术语来说，负面冲击) 发生时，经济活动遭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它的倒闭表明一些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它们的失败可能是灾难性的。同样，一些国家深陷全球金融体系之中，以至于一个负面冲击就能够影响到整个全球经济。

评论家提出了“联系太过紧密，以至于不能破产”这一说法来表明一些参与者 (金融机构和国家) 太深陷于网络之中以至于构成了系统风险，也就是说，它们的倒闭可能会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金融危机过去几年后，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为维持金融稳定需要理解如何定义和衡量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以及和系统风险之间有什么联系。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网络分析法，这种方法曾被传染病学界用于调查病毒的传播。

网络分析法把金融系统看作是一系列参与者通过金融合约互相连接在一起 (见专栏)。比如，银行间市场就是一个互相提供短期贷款 (通常是隔夜贷款) 的银行网络。网络中的银行每时每刻都因由借贷活动累

图 1  
核心区  
全球银行网络核心的 15 个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资金流动广泛。



资料来源: Minoiu 和 Reyes (2011 年)。  
注: 直线代表 2007 年单个国家之间以银行为中介的资金流动。细线代表的资金流动额在 10 亿—50 亿美元, 中线为 50 亿—100 亿美元, 粗线代表 100 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流动。这些国家是: AUT= 澳大利亚, BEL= 比利时, CAN= 加拿大, CHE= 瑞士, DNK= 丹麦, DEU= 德国, FRA= 法国, GBR= 英国, IRL= 爱尔兰, ITA= 意大利, JPN= 日本, LUX= 卢森堡, NLD= 荷兰, SWE= 瑞典, USA= 美国。

积形成的总债权和债务关系而相互影响。有很多方法可以使得一个银行在网络中变得更为重要和成为核心。它可以和一大批银行存在借贷关系；可以拥有其他重要银行的债权；可以在总交易中占据巨大份额；可以成为很多没有直接借贷关系的银行提供资金流的中介。

同时还存在一个全球性国家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国通过资金流动、贸易或移民，或者同时通过以上三种途径，相互联系在一起。

利用网络分析法来评估金融稳定性的第一步就是确定金融系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类型。我和哈维尔·雷耶斯（Javier Reyes）通过网络这一视角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间的银行关系（Minoiu 和 Reyes, 2011年）。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如何评估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关联水平？相互关联度是否随时间的变化发生改变？在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关联度异常高吗？仅通过观察总体资金流动是否很难发现典型的相互关联模式？

## 构建网络

为了构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联系网络，我们称之为全球银行网络，我们采用了1978—2010年间一大批国家间以银行系统为中介的跨境资金流动信息的独特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由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被称为BIS地区银行统计。向BIS汇报数据的金融机构一般包括特许银行，根据不同的国家还包括大的证券公司和境外银行。他们汇报诸如贷款、存款和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信息。这些数据以BIS汇报银行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基础编制，所以特别适合于分析金融联系的地理类型。

我们对两组国家进行了网络分析：网络的核心国，15个长期向BIS汇报数据的发达经济体；边缘国，169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我们样本中的边缘国有的仅

### 什么是网络分析法？

网络的构件是节点（代表代理、金融中介、国家等）和节点之间的联结（或连接）（代表节点之间的关系，比如所有权、关联或资金流动）。这种关系可能是二元形式的，比如如果节点之间有资金流动或者关联关系则存在这种关系（用数值1表示）或者如果节点之间没有联结则这种关系不存在（用数值0表示）。也可能是以加权形式表示，即衡量这种关系的大小，如节点之间资金流动的额度。网络分析法是一系列描述网络中节点的位置和评估网络的整体结构的方法。

网络分析法已经被应用于传染病学和社会学中。近年来，相互关联度在本次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促使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

在最近几年向BIS汇报数据，有的从来不汇报数据。我们仅集中选取了从1978年起就不间断地向BIS汇报数据的15个经济体，这样网络的变化就不会受到汇报国样本变化的影响。

我们构建了两个网络。核心—核心网络展示的是15个发达经济体间的资金流动，如图1所示。核心—边缘网络展示的是15个发达经济体向世界其他国家的资金流动（从世界其他国家流向这一核心的资金流动不包含在内）。把核心—核心网络和核心—边缘网络叠加起来便可得到全球银行网络。国家间的关系（联系）代表以银行系统为中介的正向的资金流动，或者说是净投资。

## 关联度和聚类度

我们重点关注两种简单的、广泛使用的描述全球银行网络关系密度的相互关联指数，并重点关注两个国家间关系的存在而不是资金流动的量级——关联度和聚类度。

关联度衡量的是双边关系的密度，即网络中国家间的联系除以所有可能的联系的总数。聚类度衡量的是三方关系的密度——在三方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借款国之间也互相提供借款，可粗略地定义为网络中已存在的三角关系数量除以所有可能的三角关系的总数。在核心—核心网络中，三个核心经济体互相提供借款即是一个三角关系；在核心—边缘网络中，一个边缘国向两个互相提供借款的核心经济体借款即形成一个三角关系。

我们最开始研究的是总资金流动。以银行为中介的资金流向我们样本中的国家的资金额度显著增加。通过对比1978—2002年的平均值和危机前的峰值，我们发现，核心经济体间通过银行转移的资金流的年平均值是正的净360亿美元，并在本次危机前达到2300亿美元（见图2）。同样，从核心国流向边缘国的银行资金流初期的平均值是15亿美元，在本次危机前飙升到64亿美元（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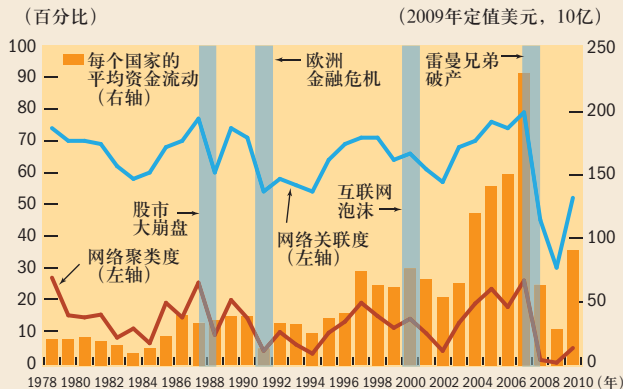
然而，金融关联度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相互关联度和总资金流动一样，在金融危机之前增加并在金融危机之后回落。但在本次危机前，关联度并不是异常高。事实上，核心—核心网络的关联度和聚类度都表明相互关联度在其他金融危机之前也达到了类似的水平，比如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核心—边缘网络的关联度在危机前也增加了，这可能反映了边缘国家金融开放程度增强的长期趋势。此外，在本次危机前，这两种网络中国家关系密度的增加比起前所未有的总资金流动的增加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本次危机一个独有的特征是，在危机之后，网络

图2

## 核心资本流动

核心经济体之间以银行为中介的资金流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迅速增长。但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网络关联度和聚类度却没有相应的增加。



资料来源：Minoiu和Reyes（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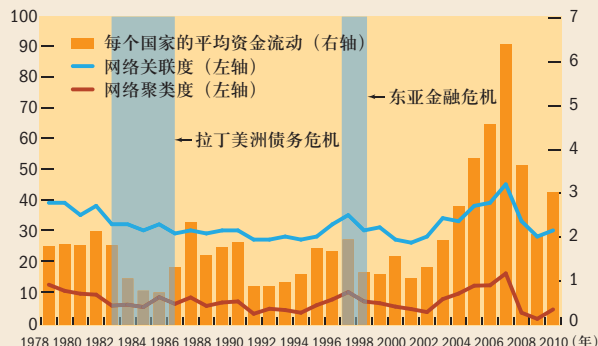
注：核心经济体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英国与美国。关联度衡量的是双边关系的密度，即网络中国家间联系的数量除以所有可能联系的总数。聚类度衡量的是三方关系的密度——在三方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借款行之间也互相提供借款，计算方法是网络中已存在的三方关系数量除以所有可能的三方关系的总数。

图3

## 向边缘国蔓延

衰退前，核心经济体流向边缘国的银行资金流动有所增加，相互关联度——关联度和聚类度——也有小幅的增加。

(百分比) (2009年定值美元, 10亿)



资料来源：Minoiu和Reyes（2011年）。

注：核心经济体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英国与美国。关联度衡量的是双边关系的密度，即网络中国家间联系的数量除以所有可能联系的总数。聚类度衡量的是三方关系的密度——在三方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借款行之间也互相提供借款，计算方法是网络中已存在的三方关系数量除以所有可能的三方关系的总数。

密度降到了22年的最低点。聚类度，即三方关系的盛行，在核心—核心网络和核心—边缘网络中几乎都消逝了。危机似乎导致了前所未见的网络密度的下降。但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上，关联度和聚类度和总资金流动一样，也遵循盛衰循环。但这个模式在本次危机中并没有延续。2007年的网络密度和危机前水平相仿，但它在2008—2009年回落的程度却很突出。虽然一些分析师把危机的严重性归咎于金融的相互关联水平，我们的调查却发现危机前关联度的爆发只能部分地解释危机的严重性。我们怀疑另外两个因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在危机前，以全球银行网络为中介的跨境资金流动的额度远远高于过去的几十年。其次，对金融系统最初的冲击位于全球银行网络的核心，核心中受影响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研究表明，类似的冲击因为其冲击的地点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其对金融系统造成的后果也不同（Gai和Kapadia，2010年）。冲击的位置和异常庞大的跨境金融工具流动可能就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比以前的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原因。

## 面向未来的工具

金融相互关联度——全球金融系统中机构和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类型——常被认为是本次危机之所以如

此严重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一个高度关联的金融机构的破产起初被认为是地方性的冲击，但其所造成的后果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机构和它所在国家的界限。如果决策者采用了网络分析法，那么他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允许一个中等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潜在后果。网络分析法不是孤立地看待代理，而是进行系统分析，这种方法为评估系统风险提供了一个分析相互关联度的工具。通过分析代理以及代理之间的联系，网络分析法为整个金融系统，即由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参与者组成的复杂的网络，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卡梅利娅·米诺（Camelia Minoiu）是IMF能力开发学院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Gai, Prasanna, and Sujit Kapadia, 2010, "Contagion in Finan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Vol. 466, No. 2120, pp. 2401-2423.

Haldane, Andrew G., 2009,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Network,"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Financial Student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n Amsterdam*, April 28.

Minoiu, Camelia, and Javier A. Reyes, 2011, "A Network Analysis of Global Banking: 1978-2009," *IMF Working Paper 11/74*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当移民遭遇 增长缓慢

罗马尼亚制衣厂的中国移民劳工。

迪米特里斯·帕帕德米特里欧

随着经济危机在发达经济体中继续蔓延，全球性劳工流动将发生改变

美国与墨西哥关于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争论正在逐渐减弱。来自墨西哥的净移民人数接近于零，对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许多为非墨西哥籍移民）的担忧回到了 1970 年的水平（美国边境巡逻队，未注明日期）。

美国在边境控制上的大规模投资、积极大胆的国内强制措施、墨西哥经济增速自 2010 年以来远远快于美国，以及墨西哥与美国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深入合作，是导致非法移民人数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墨西哥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意味着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墨西哥劳工越来越少，同时美国的就业机会因为经济持续低迷而大幅减少。

经济危机的后果不仅仅对美国 and 墨西哥之间的移民造成了影响。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特别容易受到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就业破坏的冲击。移民曾经是全球化以及因此而持续增加的连通性的推动力和衍生物，现在却面临着全球经济危机。

此次危机标志着，多数发达经济体享受着开放带来的种种好处（包括大规模移民）并同时面临相对很少的问题的时代已经终结。在未来几年，移民很可能会变得更有选择性，低技术移民可能不太受欢迎——至少是作为潜在永久居民，更不用说是公民。

## 就业破坏

例如，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衰退已经达到了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大约 2300 万人（约占劳动力市场的 15%）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包括非自愿兼职就业人员和准待业人口或怯志人口（见图 1）。有稳定工作的人口比例跌至 1948 年美国劳工部开始收集这些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所有劳工占比降到了 198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2 年中期，失业人口中将近 42% 已经失业 27 周以上，这增加了其工作技能退化的可能性，提高了甚至当大量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时出现工作岗位无人问津的风险，因为求职人员掌握的技能与雇主要求的技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见“失业的悲剧”，《金融与发展》2010 年 12 月号）。中年劳工（年龄在 45—64 岁之间）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的失业时间比任何其他年龄段都要长，而且更难找到与其已失去的工作有相同待遇的岗位。此外，经济衰退期间在生产能力提升和劳动力节省技术上的投资减少了衰退后的劳工需求（Katz，2010 年）。尽管劳动力规模较小，但美国目前的 GDP 依然高于五年前的水平。

这些令人担忧的数据不仅出现在美国。在美国抵押信贷市场出现第一波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衰退迹象后的五年里以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开始出现缓慢复苏

移民通常仅掌握低水平的技能或者比较难以获得认可或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力的技能。

后的三年里，整个欧洲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就业危机。2012 年 4 月，欧盟 27 国的失业人口达到 2470 万，比一年之前增长了 8%（Eurostat，2012 年）。尽管采取了如此之多的遏制经济衰退的措施，境况依然如此；2011 年有 4260 万欧洲劳工失业或半失业。

此外，青年失业率极高，而且在某些欧洲国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见图 2）。这种现象的潜在后果令人感到不安。其潜在后果包括长期“经济创伤”，出现“迷失的一代”劳工的风险，以及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前景渺茫的人们强烈追求极端的意识形态。

尽管数百万劳工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伤害，但伤害程度却不同。男人、年轻劳工（尤其是年轻移民劳工）和少数民族人口受到的伤害最大。在美国，拉美裔移民、黑人、中年劳工和青少年受到的冲击大于其他群体。在欧洲，遭遇不成比例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移民群体包括西班牙的安第斯山和北非国家移民、英国的孟加拉籍、巴基斯坦籍和葡萄牙籍移民以及希腊的大多数移民。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群体一贯易受影响。

• 技能。移民通常仅掌握了低水平的技能或者比较难以获得认可或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力的技能，而且语言能力差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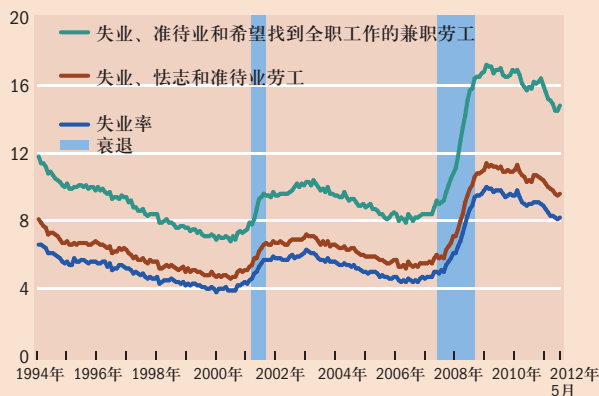
• 经验。年轻劳工、移民和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通

图1

### 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目前，大约15%的美国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或准待业状态——几乎是衰退前失业率的<sup>1</sup>两倍。

（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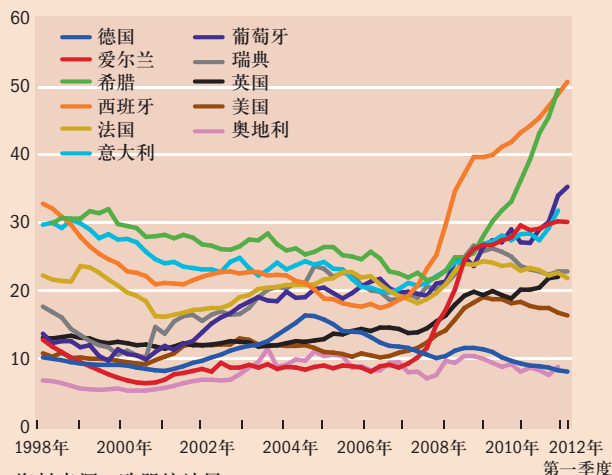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当期人口调查》，1994年—2012年5月；移民政策研究所分析。

图2

### 面临失业风险的年轻人

在许多欧洲国家，25岁以下的失业人口比例居高不下，而且将继续增长。

（青年失业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常缺乏工作经验，或多或少会面临正式的“后聘先遣”（last hired/first fired）政策。

- 暂时性就业。这些群体通常从事一些在性质上更具临时性并且根据需求周期增减的工作。

- 培训。雇主在这些劳工培训上的投资通常比较少，这使他们更有可消费性。

- 就业行业。他们从事的行业在危机中遭受了最严重的冲击。例如，在美国和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建筑业衰退，而建筑业是大批移民的主要就业来源，其中包括许多非法居民。

## 移民遭遇

在过去30年里，从中低收入国家迁入高收入国家的所有技能水平和教育水平的移民人数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据联合国估计，2008年迁移到世界上更发达地区的移民（合法或非法）人数增长了近一倍，从1980年的5.4%增加到了2010年的10.5%（联合国，2009年）。

在一些情况下，通常是在主要作为移民输出国而非接收国的国家，移民增长速度达到了和平年代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外来移民人数在其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从几个百分点增长到了14%。芬兰、爱尔兰、英国、希腊和意大利（见图3）也出现了飞速增长。在所有情况下，飞快的增长速度使这些国家没有充分的时间调整其法律和制度框架以高效接纳新来人员，并让其公共部门做好充分准

备以应对移民快速增加导致的种种变化。这为近期对移民所作出的反应埋下了隐患，例如，民族主义党派的出现，其拥有强大的、选择性的（通常是反穆斯林）反移民平台。经济危机只是加剧了对移民的消极反应。

驻守不严的边境和移民可产生积极经济效应的普遍信念，为广大移民的迁移（合法与非法）提供了条件。实际上，不断扩张的经济体能够轻而易举地吸收额外劳动力。消费者享用着低薪移民生产的低成本商品和服务，许多经济决策者称赞移民对薪资通胀产生的抑制效应。薪资通胀是受直接影响的国内劳工十分憎恶的现象，但也情有可原。

经济危机使之发生了改变。

国际移民继续增长，这是肯定的。但是，大部分增长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还包括南非、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几个其他东南亚国家。然而，相比过去30年的增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总数增长十分缓慢，即使英语国家继续准许大量的新移民进入，情况也是如此（联合国，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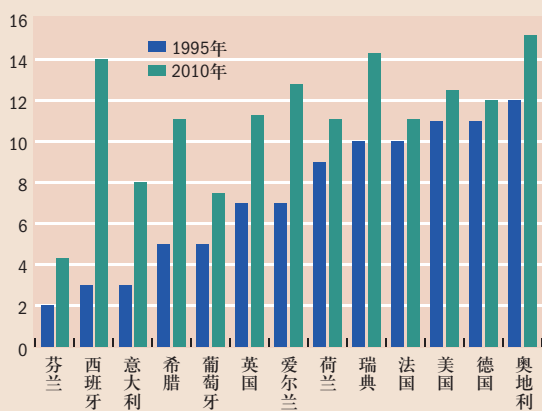
## 新常态？

后危机环境将充满不确定性，会滋生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目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高失业率和缓慢、不均衡的就业增长是否会渐渐远去，同时增长和“传统”移民模式回到危机前的大致水平？

图3  
移民涌入

外来移民在欧洲和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在部分国家，移民数量迅速增长。

（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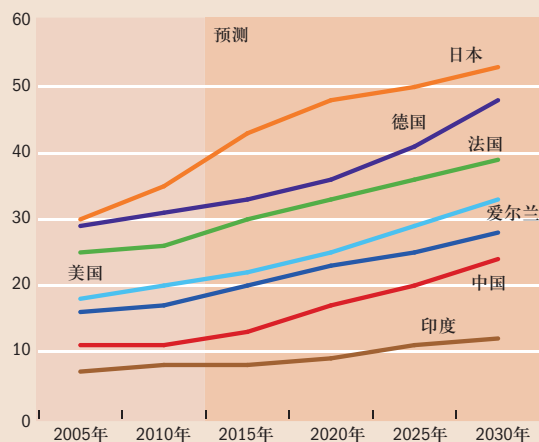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1995年数据，联合国（2009年）；2010年数据，欧盟统计局（2010年）和美国劳工部，《当期人口调查》。

图4  
劳工压力

持续减少的劳工将不得不为持续增多的退休人员提供养老支持。

（老年抚养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注：老年抚养率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除以20—64岁人口数量，再乘以100。

或者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移民水平保持在更加适中的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其始终复杂的移民历史上是否已经到达了拐点，会面临一个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同时对移民更加具有选择性的时期？劳动力市场的持续低迷将如何影响劳动力边缘群体的行为（尽管他们的选择会决定劳工的总体供应情况），这些群体包括：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怯志劳工、城镇低收入劳工、劣势和边缘化劳工（许多都属于少数族裔）、希望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女性、重返工作岗位的退休人员或延迟退休的年老劳工、避开某些太过困难或太不受社会欢迎的工作的劳工？总体而言，这些群体的选择将帮助移民接收国决定在未来几年内“需要”多少外来移民——而且政府、雇主和个人关于经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所作出的选择将帮助实现这些决定。

尽管如此，有些基本的移民驱动因素将不会改变。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时间可能晚于预期，但是老龄化将继续催生移民劳工参加工作和纳税以支持老年社会福利与关怀。在生育率长期走低的国家，新劳工输入增幅较低，加上老龄化人口增多，将使劳动力生产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老年抚养比率——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除以20—64岁之间的人口数量——将以更大幅度增长（见图4）。富裕国家的教育与培训体系将继续努力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充分预见未来的技能需求，也无法单纯地依靠本国人才发展有竞争力的国内专业化行业。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在一个异常不确定和失业率持续走高的时期，提供可信的政策响应，同时积极网罗全球人才，维护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长期竞争力。

同时，某些形式的移民将继续增长，而且在未来几年的增速有可能加快。大多数移民会对国与国之间的机会差异作出响应，这是移民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包括下列移民形式。

由于经济衰退，移民纷纷迁离高收入国家。有些移民将进入前殖民地国家，那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移民流来自爱尔兰和地中海欧盟成员国等国家。这些国家有长达几个世纪的移民传统，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了大规模输出移民的国家。现在，这些国家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移民模式。

高收入国家间的双向移民流以及从高收入国家向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移民流。高收入国家之间的移民已经持续了几代，约占移民总数的1/4（联合国，2012年）。欧盟的自由流动规定和大多数富裕国家对来自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移民的实际开放性，意味着此类流动将继续增长。南北迁移大约有1300万人，将来



穿越美墨边境进入加利福尼亚圣伊西德罗。

很可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主要锁定于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有望将这些国家变成下一批移民中心，特别是因为它们已经接纳了大量来自邻近更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实际上，为了从北部吸引大量优秀移民人才，它们正在作积极的努力，专注于通过提供税收和外汇优惠以及研究机会等激励措施吸引侨民回国发展。吸引跨国公司的优惠条件很多，如上述激励措施、招募优秀人才而无需担心高收入国家规定的某些移民限制条件以及靠近逐渐富裕起来的渴望购买其产品的新兴中产阶级等等，因此这些跨国公司正在采取措施吸引移民。

在更大程度上，吸引技术移民将成为一个政策目标。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技能与人才受到高度重视，对它们的需求正在加剧。然而，高质量的技能——例如，从重点大学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位——将不会总是像现在一样可以轻松获得，并将对移民选择的研究领域和全球教育机构产生深远影响。在许多国家，从学校招聘STEM毕业生逐渐成为了最唾手可得的政策成果。对这些毕业生的竞争很快会变得白热化。

近期国际学生的增长趋势将持续下去。目前，超过300万名学生在海外留学——几乎是2000年的两倍，而且到202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再翻一番（UNESCO，2011年）。对东道国有吸引力——培养自费外国学生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对于学生来说也有吸引力——随着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国外教育的价值正在增加。

最后，其他的移民形式也将继续增长，包括投资移民和退休移民、“投机”移民和移民子女移民，他们利用在父辈选择居住的国家的公民身份，努力在父辈国籍所在的国家探索各种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移民特点也可能发生改变。在过

去 15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移民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模式，家庭团聚和公民身份是近乎标准的最终产物。但最大的可能性是，新移民将更具临时性和更加基于合同（在性质上比传统移民更具“流动性”），而且通常不附带公民身份。

## 不可避免的现实

仔细分析当前财政和就业危机与大多数高度发达国家的移民情况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发现，有几个重要方面需要引起决策者的密切关注。

第一，权威机构必须重新调查某些关于对移民劳动力的近乎不间断需求的假设，尤其是大规模移民对经济增长与繁荣至关重要的观念。现实情况更加微妙。将来极有可能出现更具选择性的移民和更积极的移民体系管理。这一点将通过移民政治和适当治理实现。批准雇主申请雇佣几乎不具备任何技能或仅具备一些

## 将来很有可能出现更具选择性的移民形式。

可轻松习得的技能的新移民，有可能逐渐成为过去时。决策者也会更加认真地考虑如何投资于在经济上受到重创和被边缘化的劳工以及跟不上全球化步伐的劳工的工作技能。再次重申，政治和尽责的领导将使这种投资成为必然。此外，危机迫使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进行的经济重组以及由此导致的为提高生产力所做的投资，证明了大规模移民更难持续下去的观点。最后，接收移民的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迫切需要执行遏制非法移民和非法就业的法律。过去，这些政府非常不愿意执行此类法律。

第二，随着危机继续蔓延，越来越多的长期失业人口将看到自己的技能进一步退化。因此，决策者面临逐渐恶化的结构性失业所造成的恐慌——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与这种现象斗争了一个世代，而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避免了这种恐慌的出现。这表明，政府和雇主将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在其合法劳工上的投入，无论他们的出身或先前资质如何，而且劳工将不得不加大对自身的投入。当经济增长回暖时，雇主和更广泛的经济体将需要技能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的劳工将获得很好的就业机会；不满足这些条件的劳工将被远远落在后面——雇佣劳工而不对其进行投入的经济部门也将面临淘汰境遇。

第三，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削减移民融入基金，有

可能带来更多、更长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无谓地增加经济复苏的挑战性。例如，西班牙在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移民融入预算，大多数国家也正在削减为移民和其他边缘化群体提供的融入援助和公共服务。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前那些境遇相对较好的移民群体也有可能是在复苏阶段繁荣发展。但是，那些已经深陷困境的群体不太能够恢复，将面临巨大的经济福利障碍，而且这些障碍有可能持续到下一代。成功移民融入的基本驱动因素——例如语言能力、教育、相关技能与资质、认证、当地工作经验和职业联系——不可能发生改变。但是，由于雇主会从大量的失业人口中选择合适的劳工，这些特质对移民的重要性将继续增长，而缺乏这些特质的后果将更具破坏性。■

迪米特里斯·帕帕德米特里欧（Demetrios G. Papademetriou）是移民政策研究所所长。

### 参考文献：

- Eurostat, 2010, "Population by Sex, Age Group and Country of Birth."  
——, 2012,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April).
- Katz, Lawrence F, 2010, "Long-Term Unemployment in the Great Recession," Testimony for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April 29, Washington.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9,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08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 POP/DB/MIG/Stock/Rev.2008).  
——, 2012, "Migrants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The Role of South-South Migration," Population Facts 2012/3.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11,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1 (Montreal).
- U.S. Border Patrol, n.d., "Nationwide Illegal Alien Apprehensions Fiscal Years 1925-2011."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January 1994-May 2012,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Washington).





# 金融区域主义

河合正弘、多梅科·隆巴迪

区域主义早已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12年年初，国际上已经制定了500多个双边的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大部分是在过去的20年间做出的。

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尽管时间不长，但其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比如，在今年6月，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20国集团（G20）领导人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的会晤中强调“有效的全球和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重要性”，同时，IMF的重要政策委员会也不断重申“与区域金融协议合作……”对IMF的重要性。

虽然有关贸易区域主义的学术论文很多，但是我们对金融区域主义的了解却甚少，尽管金融区域主义对塑造国际

金融格局有潜在的巨大影响。在欧洲，情况确实如此——最近提出的欧洲稳定机制的目的是成立一个货币联盟，通过贷款对主权国家和其他对象提供直接援助。

在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国家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储备基金（FLAR），这支基金在过去30多年间一直积极地为其成员国提供融资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此外，众所周知在亚洲，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3——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国家加上中国、韩国和日本——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签订了《清迈协议》。《清迈协议》是一个多边化的协议，它在2010年3月把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网络整合成一个单独的货币互换协定，2011年，区域

区域协议正在重新塑造国际金融格局并帮助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监督机构——东盟 10+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在新加坡开始运营。

## 促进更广泛的一体化

这些区域金融协议的形式有所不同，包括政府出资、外汇储备库出资和货币互换协议等形式。尽管这些区域金融协定是多样化的，但其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所进行的更广泛的努力。

欧洲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欧洲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导致欧洲支付联盟的建立，该联盟是更为先进的区域框架的前身，并最终在 1999 年形成了货币联盟。

## 当遭遇系统性或区域范围的动荡时，区域协议和IMF或需通力合作。

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尽管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其在此领域具有最为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给商品和服务创建一个区域共同市场，拉丁美洲的决策者成功地建立了区域内支付结算协议、两家开发银行以及 FLAR。后者包括 7 个中小经济体组成的成员国，虽然成员国数量较少，但正合适，这些国家之间有着牢固的文化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确实，FLAR 直接证明了区域（次级）协议具有为其成员国提供更强烈的主人翁感的潜力，否则这些成员国在拥有 188 个成员国的 IMF 中，需要努力拼搏才能使组织听到其呼声。

正是这种加强的区域主人翁意识促使东盟 10+3 国家在 2000 年 5 月签订了《清迈协议》。这 13 个国家对国际社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极其失望，所以决定减少其对 IMF 的依赖。

日本曾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但遭到美国和 IMF 的反对，不久后《清迈协议》便签订了。《清迈协议》反应了更广泛的一体化的努力，旨在加强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和金融往来。这种努力还包括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项目，旨在开发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包括信贷担保和投资安排的推行，其目的是促进区域内企业债券的发行。

另一个潜在的重大举措是形成东盟 10+3 或东盟 10+6（东盟 10+3 扩大范围，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包括进来）的自由贸易协定，以便为商品、服务和投资打造更为广阔的市场。同时，有人提议成立亚洲

金融稳定对话和亚洲货币一揽子指数旨在衡量区域内各种货币相对于区域平均水平的流动性。

## 管理区域溢出效应

区域金融协议中成员国的大小参差不齐，《清迈协议》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日本占据了东盟 10+3 出资额的 64%，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经济所占的较大权重。

虽然其规模使得这些国家不太可能成为借款人，这些国家的份额比例突显了区域金融协议的一个重要职能，即管理区域溢出效应和抵御区域外问题的影响。区域协议可以用于处理发源于小经济体的区域间贸易和投资流动纷争，从而保持区域的整体稳定性。

不足为奇的是，FLAR 的小成员国从基金中受益匪浅，但同时基金也保护了较大的经济体。比如，由于与厄瓜多尔重要的贸易关系，哥伦比亚也间接地从 FLAR 对厄瓜多尔不断提供的支持中获益。

确实，区域范围内拥有最高权利的金融中介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区域的对外事宜。比如，FLAR 的评级高于其任何一个成员国，这使得 FLAR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从金融市场借得资金并根据区域优先权对资金进行再分配。

然而，《清迈协议》也反映了区域金融协议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制定和执行危机贷款政策的约束条件的能力有限，注定只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属项目。这种现象被称作“IMF 链接”，根据这个链接任何超过一定限额的提款都必须有相应的 IMF 程序。这个限额起初设定为最大借款限额的 10%，现在提高到 30% 并计划在 2014 年提高到 40%。“IMF 链接”的松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启动《清迈协议》的阻力：该协议从来没有被启动过，这是因为协议捆绑“IMF 链接”，并且成员国不愿意向 IMF 借款。

## 获取洞察力

最有可能的是，“IMF 链接”任何进一步的削弱都取决于新机构——东盟 10+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经济监察能力的加强。

AMRO 必须证明它能与其成员国拉开一定的距离，行使其权力——不仅仅是权力——以独立评价其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这是区域金融协议面临的共同挑战，甚至 IMF 也面临这样的挑战。

欧洲稳定机制的这种职能是由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的，也涉及到 IMF。FLAR 不执行监察职能，也没有任何同行评审论坛以评价其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然而，东盟 10+3 经济评论和亚洲政策对话本应

是监察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其作用更像交换信息的论坛，而不是同行评审或者评价或在必要的情况下修改政策的尽职调查框架。

确实，如果区域协议与其成员国之间缺少距离，将会影响其制定危机借款政策的约束条件，并因此影响其执行情况。

欧洲稳定机制虽不强制但却积极鼓励保持 IMF 链接。然而，FLAR 在借出资金时却没有政策约束条件。这样，其成员国实际上给予了 FLAR 超高级别的地位，就像这些成员国始终履行储备基金义务一样，即使在商业债权人违约或者陷入对 IMF 的欠款中也是如此。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20 世纪 80 年代，秘鲁同时向 IMF 和 FLAR 借款，但却偏离了 IMF 支持程序的轨道。在与国际社会发生纠纷后，FLAR 向秘鲁提供了金融支持。秘鲁总统艾伦加西在 1985 年上任后，宣布外债还款以其外汇收入的 10% 为限。这个国家对 IMF 的欠款越积越多，但却继续履行其对 FLAR 的还款义务。最后，阿尔韦托藤森总统在 1990 年上任，秘鲁才结清了其对 IMF 的欠款，与 IMF 的关系也开始正常化，随后，秘鲁在 20 世纪 90 年代获得了一系列支持。

FLAR 能为其成员国提供流动性的支持，它既能在平时协助 IMF 提供支持，也能在困难时刻替代 IMF 提供支持。然而 FLAR 行使后一个职能的前提是不利冲击应限制在足够小的区域，并且对区域金融协议基金的需求需依次产生而不是同时出现。也就是说，为获取更广泛国际社会的额外贷款和 / 或债务重组形式的支持，必须调整政策，而缺乏限制条件可能会推迟政策的调整。

## 阐明各自的职责

想要阐明区域协议和 IMF 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非易事，更别说阐明一个区域金融协议的经验如何才能应用于另一个上面了。

首先，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必须不断加强分工程度。当小规模危机发生在一个或两个小国家时，区域金融协议能更好地提供危机贷款，而不必涉及 IMF。然而，当发生系统性的或者区域范围的动荡时，考虑到单个区域与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和区域借款能力的有限性，区域金融协议与 IMF 也许必须通力合作。

在成立初期，区域金融协议可能很难独自制定政策约束条件并监督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IMF 来履行这样的职责，同区域基金一起制定政策约束条件。然而，随着区域基金——如亚洲的《清迈协议》和 AMRO 的能力的显著改善，区域协议可能会在危机管理中扮演领导角色，包括提供流动性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约束条件，仅需有限的 IMF 的协助。

其次，需要达成共识的是在哪些领域区域协议和 IMF 的竞争是健康的甚至是有益的，而在哪些领域竞争是不利的。

在信息提供、预测、研究和最佳实践的制定、推广和传播方面的竞争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在制定限制性条件方面的竞争却是无益的，因为这会破坏总体的稳定努力。比如，如果同时对私营部门的参与施行不同框架，就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混乱。

到目前为止，合作是在特定的基础上运行的，但是这种实用的做法，在最大程度地获得灵活性的同时，也会加大危机中合作失败的风险和随后扩散到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欧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也就是说，很难设计一个类似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程序，这个程序被编入 WTO 第 XXIV 条款。这项条款在理论上使得 WTO 有权评价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协议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相容性。

然而，如果构造一个同样的程序使得 IMF 拥有类似的职能，那么其治理结构必须显著改革，以便使其合法履行有争议的职能。G20 也许能做到这一点，它已在 2011 年引入了一些基本条款，但是由于很多国家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缺乏普遍性。换言之，欧盟仅仅是 G20 的一个成员，只有一个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属于 G20，没有一个拉丁美洲的 FLAR 的成员国属于 G20。

区域在国际金融框架中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并在不断发展演化，我们必须加强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了解区域是如何帮助实现区域稳定的，因为金融区域主义和贸易区域主义一样，几乎肯定是要存在下去的。■

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是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院长。多梅科·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是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由两人共同撰写的《货币地区主义及国际货币体系》（Financial Reg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将于近期出版。

# 分割风险

必须通过增强有助于确保金融稳定性的国际体系来保障全球化带来的效益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现任IMF总裁。

在经过过去五年的动荡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危机之后（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各个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紧密联系），人们可能很容易忽略全球化一体化带来的效益。但我们不能这样想。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及相互联系性的增强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大的效益。在过去几十年间，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为世界很多地区的强劲增长和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全球化已帮助贫困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与富裕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并使社会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且更加开放。

不过，仍可能出现一些新的、不常见的风险。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体化所带来的效益，就必须有效地控制这些风险。

## 风险大爆发

正如本次危机多次显现出的那样，风险能够非常快速地在整个系统中爆发，有时甚至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小范围的冲击——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希腊政府债券的不确定性以及西班牙银行资金紧缩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当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危机常常跨越国界。

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发达经济体本身具有脆弱性，再加之其政策缓冲有限，因此系统波动性很大，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待风险的情绪可以很快转换。然而，客观事物却不可能出现很快地转变，渡过脆弱时期和重建缓冲机制可能耗费数年的时间。我们如何才能保障和增强从一体化中获得的效益，而不是让那些更倾向于闭关锁国的人得逞？

简而言之，目前的问题是，可以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架构的建设滞后于快速发展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今金融体系已全球化，但确保金融系统稳

定性的架构却仍然主要是国家性的。这意味着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应对冲击方面的能力不堪一击，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很快就用完了所有的政策手段。

## 关注合作

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免受危机的影响。鉴于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所采取的摆脱危机的办法也必须是全球性的。通过携手合作，而不是单独“应战”，我们可以更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措施的效率。

例如，在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很快采取的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政策，帮助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经济灾难的发生。近来，有关国家的政府承诺将投入4500亿美元来增加IMF的资金，帮助弥补全球潜在的融资缺口。不过在危机过去五年后，我们也可看到缺乏有效合作可能带来多么高昂的代价。

IMF的研究结果表明，20国集团（G20）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协调性得到增强，将使全球GDP增长7%，并在中期内新增36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危机期间全球共减少了大约3000万个就业岗位。这种集体采取政策行动的价值（反映在G20的“相互评估程序”之中）也是IMF已提倡多时的观点。

金融行业的改革也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行动。目前在此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提高资本比率以及对流动比率进行探讨等。不过，一个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仍在建设之中。此方面的优先领域包括：

- 加强管制，为实施已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并在那些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方面（包括跨境银行问题的解决）取得更大的进展，必须加强管制。同时，还必须审查金融行业的所有“阴暗面”，如



影子银行、避税天堂、衍生品等。衍生品可以转移至部分票据交换所，以提高透明度和降低总体风险。

• 赋予监管者适宜的法律权力，充足的资源和运营独立性，类似于中央银行享受到的特权和自治权。管制只有得到执行才能得以加强，这意味着监管者必须拥有执行规定所需要的能力和意愿。

• 认识到金融机构本身也有责任。必须建立适宜的激励机制、私营部门问责框架、高效的内部治理体系以及更好的风险管理模式，包括防止过度承担风险的税收体系。

当然，政策合作并非 G20 或国际机构的唯一合作领域。近来，我们看到部分国家考虑在地区内或地区之间开展合作。比如在欧元区，所采取的部分积极举措包括加强统一的防火墙，即“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及其永久性的替代者“欧洲稳定性机制”，以及开展统一银行监管和加强金融一体化的承诺。必须推进实施，这一点至关重要。亚洲各国已重新承诺开展合作，包括最近决定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的规模扩大一倍。按照该协议，亚洲十国同意互换货币。该协议的作用已从应对危机拓展至预防危机。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我个人认为不仅全球合作的步伐已经放缓，甚至还存在一些倒退的迹象：世界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以其他国家的储户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其本国的储户和债权人，为本地的金融体系提供更多的支持，并对国际化带来的好处存在疑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跨境解决问题重重的银行或弥补数据缺口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系统风险很高、持久的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压力不断增加的时代，不连贯的系统方法和全球合作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要应对这些风险，我们必须采取持久和开展强有力的政策合作。

## 加入IMF

IMF 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它必须更加重视认识这种相互关联性，并将这种认识纳入到风险和政策分析之中。必须为跨境合作和增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设计得出启示。此外，政策分析必须关注于整个体系的稳定性，而非仅仅是每个国家的稳定性。

基于我们独特的全球化视角，我们可以描绘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连接性，并指出一国的发展和政策将对其他国家造成何种影响（即我们的“溢出效应”分析），为决策者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这种分析有助于更好地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开展全球性的统一监管。我们最近的“溢出效应”分析报告涉及“系统性五国（地区）”（Systemic-5），即中国、日本、欧元区、英国和美国，是一种新型的前沿性综合分析。

近期，我们批准了一项新的“监管决议”，有助于确保 IMF 对其成员国经济的评估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评估保持一致，监管范围包含各成员国对全球经济稳定性的溢出效应。

同时，我们还在更加深入地研究金融行业的健康状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即“宏观—金融”联系。我们当然不会做重复性的劳动，也不会去树立任何标准。不过，我们将与其他制定和协调国际金融标准的组织，如金融稳定委员会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进行协调，确立我们在金融行业的监管任务。

目前，我们的政策仍存在部分巨大的差距。例如，没有能够发现全球金融风险和不平衡累积并可能很快恶化的简便方法。国民收入账户使我们能够很快看出实体经济中的不平衡和风险状况。然而，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绝大多数的国家中，目前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识别金融风险和不平衡状况的方法。

## 在当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危机常常跨越国界。

目前我们在确立全球金融风险方面已取得进展，通过银行压力测试和创新活动，如 IMF 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早期预警演练”来更加深入地研究全球金融风险。不过，鉴于这种相互关联的复杂性，必须加强合作和取得更大的进展，包括通过填补数据缺口项目，才能弥补上述不足。

同时，我们还在不断深入认识各国的作用及其相互关联性的性质和影响（见 2012 年 IMF 董事会报告《加强监管：相互关联性 & 集群》（Enhancing Surveillance: Interconnectedness and Clusters），该报告可从 IMF 网站 [www.imf.org](http://www.imf.org) 上获取）。例如，在“系统性五国（地区）”与更大系统中的很多国家（地区）相互联系的同时，其他很多经济体又形成紧密相连的贸易或金融“集群”，如欧元区或亚洲供应链中的这些“集群”。部分经济体将不同的“集群”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体可以称之为“门户国”（gatekeeper），如奥地利（在金融方面将中欧和东欧联系在一起）、瑞典（在金融方面将波罗的海诸国联系在一起）等。这些经济体既可以将外部冲击从一个经济体传入另外一个经济体，也可以减弱或者增强这些外部冲击。因此，确保这些作为“门户国”经济体的稳定性，将有益于全世界，有助于减弱外部冲击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可以说，最大的挑战是政治上的挑战。决策者通常在国内拥有很强的执行权。然而，要说服国内各个利益相关方去考虑，更不要说同意，那些受益来自于国际层面的艰难决定，则并非易事。■

# 中国式消费

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玩具批发商。

## 中国需进一步促进家庭消费，确保增长更具包容性

史蒂文·巴奈特、安拉·密尔维达、马尔哈·纳巴

首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测试。2011年，对全球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哪个国家？答案是：中国。没错，该经济体普遍被认为消费很低，但在去年中国对全球消费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作为该领域传统领军者的美国（见图1）。

这是个惊人的变化。但这是否足以说服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中国需进一步消费，确保其令人瞩目的增长真正具有包容性——这也将促进全球经济更为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言论的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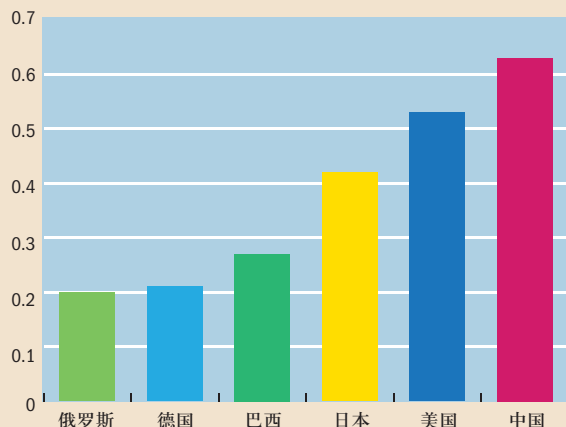
### 长期低迷

答案是否定的。然而，这些说法也不是完全不正确。家庭消费这一自主增长的最终驱动力，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见图2）。中国的该消费比例远低于其他收入水平相仿的国家，也低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对于其他历史上发展较快的经济体（如韩国和日本）而言，其比例也相对较低，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其经济快速发展黄金期的前期，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是中国的区别在于家庭消费在国家经济中所占比例一开始就较低，并持续下降（见图3）。中国对世界消费增长的贡献也因此归功于其经济总量增长比其

他正在消除金融危机前过度支出的主要经济体更加快

图1  
最高塔

去年，中国消费增长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家庭消费，万亿美元，2011年)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员工的计算。  
注：使用期内平均汇率转换为美元。

速，而不在于家庭消费在其经济中所占比例是否增加。

在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主要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Aziz 和 Cui，2007年）。在快速增长期，经济越来越朝着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公司收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至关重要的是，低消费比例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特征，这其中包括服务业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业不发达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实际利率较低（Guo 和 N'Diaye，2010年）。

## 保险起见

消费下降也体现在家庭存款率上升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镇家庭存款率低于可支配收入的20%。去年，这个比例超过了30%。在此期间，农村家庭存款率也有所增长，但低于城镇家庭存款率（见图4）。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存款率的上涨？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预防性动机影响了存款决策（Barnett 和 Brooks，2010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取消了“铁饭碗”福利制度，导致教育和健康支出成为家庭主要负担。由于国有企业重组，曾经由国有企业提供和资助的公共服务有所减少。这些有关社会福利服务的深刻变化对各年龄段的家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年轻家庭增加其存款用于子女的教育支出，而年长家庭则将存款用于应对未来可能的健康支出以及退休金的减少（Chamon 和 Prasad，2010年；Chamon，

Liu 和 Prasad，2010年）。

城镇住房私有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重要变化。城镇地区的自置居所的人数自住房私有化以来迅猛增长。房屋购买仍主要依赖个人存款。由于年轻家庭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因此其存款率有所增加（Chamon 和 Prasad，2010年）。

最后，近年来，中国家庭一直针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对支出和存款作出决策。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就业机会的变化以及新的购房目标，这些都影响着家庭抉择。由于没有足够的途径获得消费贷款或保险来帮助家庭克服经济困难并保护其免受重大经济损失，中国家庭采取自保的方式：将家庭存款作为应对未来收入下降或健康等问题的缓冲。存款利率下降导致家庭存款增加，以形成足够的缓冲，达到其存款目标。因此，过去十年来实际利率下降推高了城镇家庭存款率（Nabar，2011年）。

## 扭转趋势

2011年中国是全球消费增长最大的贡献者，这显示出中国消费有潜力成为全球最终需求的重要来源。但如要上述情况持久、自续的进行，中国还需寻求方法，加速向消费型增长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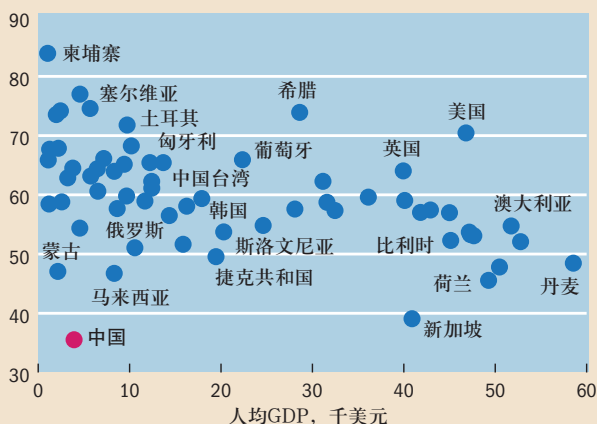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消费正在快速增长，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实际最终消费支出自1995年来一直以年平均8.5%的速度增长（见

图2

### 配角

与收入水平相当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平均个人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个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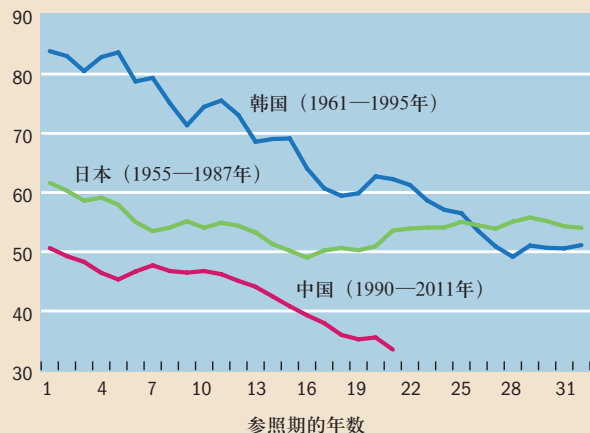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员工的计算。  
注：为控制商业周期效应，本图所采用的是5年平均值得。

图3

### 低和更低

中国的消费水平甚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后者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其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

（家庭消费，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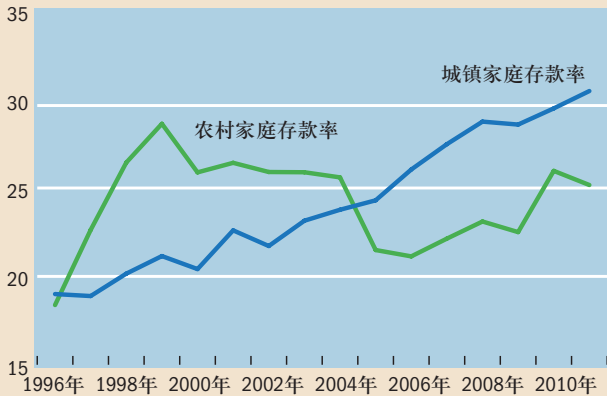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员工的计算。

图4  
存款

尽管其经济前景已大幅改善，但城镇和农村家庭一直在增加存款。

(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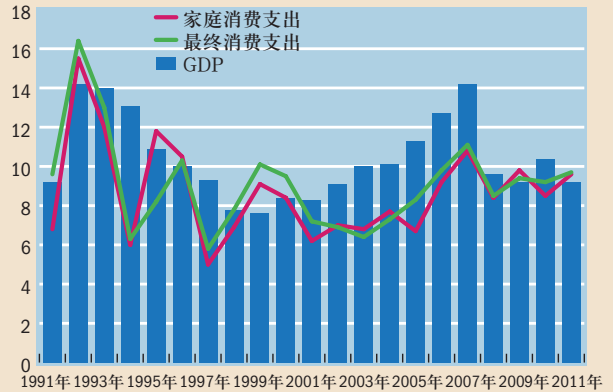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IMF员工的计算。

图5  
相比还是较低

消费在增加，但是其增幅低于GDP的增幅。

(年增长率，实际计算)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员工的计算。

图5)。这个数字引人注目且令人羡慕，但是中国 GDP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消费正在快速增长，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却往往被忽视的事实。

的平均增长速度为更惊人的 10%。中国的消费确实增长很快，但比不上 GDP 的增速。快速的消费增长与中国减少贫困——自 1992 年以来，已有超过 4 亿人口摆脱贫困——以及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齐头并进。

然而，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努力。坚定不移地向消费型增长转变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进步：

- 提高家庭收入。其途径有通过降低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的工作门槛；加快金融改革，提高存款收益；通过提高资本成本以及能源、水利、土地和排污定价改革来限制对资本密集型增长的刺激。

-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约预防性动机。其途径有通过扩大公共医疗保险，以覆盖慢性和重大疾病，以及加强养老金制度（特别是改善异地适用性）。

- 减少存款需求。通过扩大社会保障住房，改善获得按揭贷款的途径以及减少风险压力的方式，使民众买得起房。

这些改革措施符合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如能认真贯彻实施这些改革措施，中国可成功转型为以

个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这将有助于维持中国经济持续、更具包容性地增长，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有力、平衡地增长。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而言，无疑是正确的。■

史蒂文·巴奈特 (Steven Barnett) 是IMF亚洲及太平洋部的处长，安拉·密尔维达 (Alla Myrvoda) 是该部的研究员，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是该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Aziz, Jahangir, and Li Cui, 2007,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 IMF Working Paper 07/181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rnett, Steven, and Ray Brooks, 2010, "China: Does Govern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Boost Consumption?" IMF Working Paper 10/1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amon, Marcos, Kai Liu, and Eswar Prasad, 2010, "Income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Savings in China," IMF Working Paper 10/28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amon, Marcos, and Eswar Prasad, 2010,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2, No. 1, pp. 93-130.

Guo, Kai, and Papa N'Diaye, 2010, "Determinants of China's Private Consumpt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MF Working Paper 10/9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abar, Malhar, 2011, "Targets, Interest Rate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Urban China," IMF Working Paper 11/22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返归基础 [www.imf.org/basics](http://www.imf.org/basics)

# 读懂经济学

返归基础：

我们把所有经济基础知识汇编在一起，为学生及他人提供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简明扼要的解释。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  
FinanceandDevelopment](http://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此外，《金融与发展》对经济学人物的访问也出合集了，请登录  
[www.imf.org/people](http://www.imf.org/people) 浏览。



# 聚焦变化

中国的对外顺差正在减小，并影响其亚洲贸易伙伴。

卡车运载着俄罗斯木材，通过中国木材交易将其运抵中国满洲里进行加工。

马尔哈·纳巴、奥拉夫·恩特罗博拉斯特尔

5年来，全球经济信息充斥着各种下滑的数据：资产价格下降，就业减少，工业产量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也在此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采取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其与贸易伙伴的顺差——经常账户余额，也就是来自境外的收入扣除对国外贸易伙伴的支出后的净值——从2008年的4120亿美元，即GDP的9.1%，下降到2011年的2020亿美元，即GDP的2.8%（见图1）。

下降的指标通常反映出了经济形势的不乐观。但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减少是否应视为是好消息，以及其经济重新趋于平衡的一个标志呢——从依赖出口转变为由内需拉动的稳定增长？如果确实如此，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的其他亚洲经济体将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

## 顺差下降

毋庸置疑，中国对外顺差的急剧萎缩反映了其最大商品输出目的地国家的低需求。绝大部分人认为从经济繁荣时期到2007年，中国生产的衣服、鞋子和玩

具疯狂地输入给美国的消费者。但是，中国出口商对美国市场的进军远远超出了沃尔玛和塔吉特（Target，美国连锁超市）。21世纪初，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机械装置和设备占其出口增长总量的10%到15%。在经济危机之后，由于美国私人投资，特别是在房屋市场投资的下降，该比例下降到5%。同时，中国进口的矿产和大宗商品却自经济危机期以来大幅增加，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政府增加支出，以支撑国内经济。

但是除上述周期性影响因素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中国对全球经济危机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政策应对——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如公路、高速铁路和改善内陆各省与沿海城市间的出行便利——这些都促使了投资水平的急剧提高。以GDP所占百分比来看，中国投资支出从经济危机前的41%增加到2009年的48%。当刺激经济的项目力度减弱，且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开始放慢后，私人部门强劲的制造业活动和社会福利性住房建设确保了2011年投资在GDP占比仍然接近50%。



其次，中国贸易条件（出口相对进口的平均价格）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就开始不断恶化（见图2），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几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其进口逐渐转向价格不断提高的矿产，而其出口则转向价格不断受竞争制约的机械设备。其他的外向型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发展期也经历过相似的贸易条件下滑。就中国而言，庞大的贸易流规模表明其对外顺差对出口和进口价格变换非常敏感。自2009年起，对进口大宗商品和矿产持续强劲的需求以及中国投资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条件恶化的潜在趋势。

第三，中国货币，即人民币的升值是反映在国内经济的根本变化中的一部分，这也导致了其贸易顺差的下滑。

### 持续重新平衡？

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型是否代表其经济已经摆脱了对出口的依赖，而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再平衡的状态？尽管政策已经重新定位，将其经济增长重心放在国内需求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中国对外顺差的下滑主要靠国内投资的增加来弥补。目前尚未有足够证据证明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稳定增长（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中国式消费”）。来自于近期投资增加的产能增长可能最终被用于国内生产——以较高的最终价格销售给中国家庭。但是如中国公司继续寻求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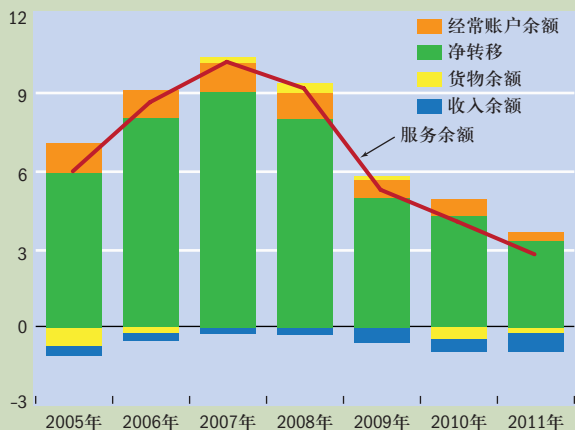
口机会的话，也可能促使未来的出口增长。或者，如果投资分配不当，且无进一步需求的话（国内或国外），这将变为产能过剩和造成银行系统中更多的不良贷款。目前还无法确定将如何使用上述的新产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对外顺差问题有所好转，中国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性仍不容乐观。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风险。中国的整体政策方向，即2010年制定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强调加快向以家庭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政策制定者同样意识到中国现存经济增长模式的副作用——高度的资本和能源密集型，就业机会创造相对较少，以及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萎缩——和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事实。实现上述经济转型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 更高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去年全国范围的城镇最低工资已经上涨。为了保护议价能力最低的低技能工人和初级工人，他们未来的最低工资上涨将必须与有

图1  
萎缩的不均衡性

自2008年起，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顺差就一直在萎缩。  
(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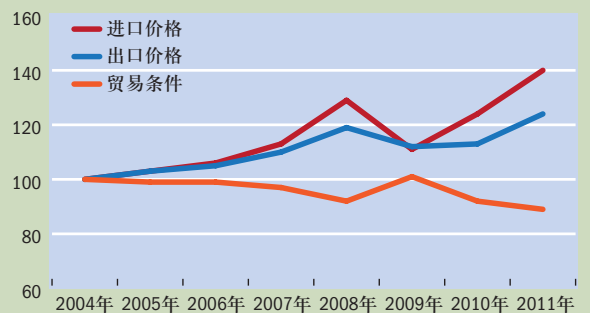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IMF员工的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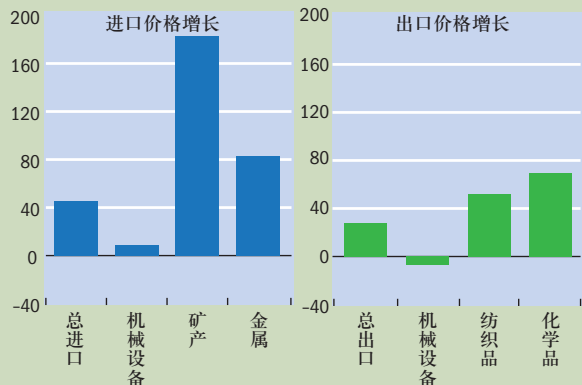
注：经常账户余额是以下几项之和：贸易余额（出口收入减去进口支出），服务余额，收入余额（外国投资收入减去对外国投资者支出）和净现金转移。

图2  
贸易条件变化

中国的进口价格较其出口价格上涨快，导致其贸易条件恶化（出口相对于进口价格）。  
(指数，2004年=100)



(百分比，2004—2011年)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IMF员工的估算。

经验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上涨比例保持一致。除此之外，降低工资税（某些情况下，雇主/雇员综合税率会超过工资的40%）将提升家庭消费所占的比例，并刺激其进一步消费。同时，人民币走势增强将降低进口价格，从而提高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

• **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将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提高消费力；医疗服务的普及需进一步改善——通过近期扩大的政府医疗保险计划，更好的员工培训和适当鼓励有经验的医务工作者迁移到农村地区。可进一步简化养老金方案的有关条例，以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到养老金制度中去。同时，更为全面的教育补助将削弱家庭，特别是年轻家庭的存款动机。

• **增加投入成本和改善企业管理制度：**政府补助和指导对生产的投入成本（如土地、能源和资本）导致经济持续转向资本密集型生产。如果投入成本能提高到更接近于其他可比经济体的水平，并且资金成本也能与它的高回报相一致的话，这样便有助削弱过度投资的动机。如果结合要求大型国有企业提供更多丰厚的分红而非囤积利润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这些措施的效果将更为显著。

• **金融部门改革：**现存体系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媒介——也就是由政府指导利率和信贷分配——倾向于以牺牲家庭和小型公司为代价，令大型企业受益。更多地依赖市场因素来决定利率，并提供更多的存款和金融选择途径将有助于提高投资的效率，增加家庭资金收入和促进消费。

如这些结构改革得以实施，家庭收入和消费将会提升得更快，而投资占国家经济中的比例将会有所下降，中国将成功转型为更低结构性对外顺差，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将最大程度的受益于这种模式，尤其是许多位于亚洲的贸易伙伴已经由于中国贸易模式的变化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 中国的亚洲贸易伙伴

为了检验中国贸易变化对其亚洲贸易伙伴的影响，有必要对中国在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区别：作为地域需求的来源，作为出口加工的枢纽，还是作为竞争对手。

自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各亚洲经济体显然受益于中国强劲的国内需求，特别是大宗商品和资本

品。亚洲供应链中，中国因向发达经济体出口，而处于中心地位，亚洲对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因为这一原因而进一步得以加强，但近年来，作为需求的来源，中国内部的经济活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IMF的预计指出，除日本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恢复到高于经济危机之前趋势，其中有60%到70%归功于中国的内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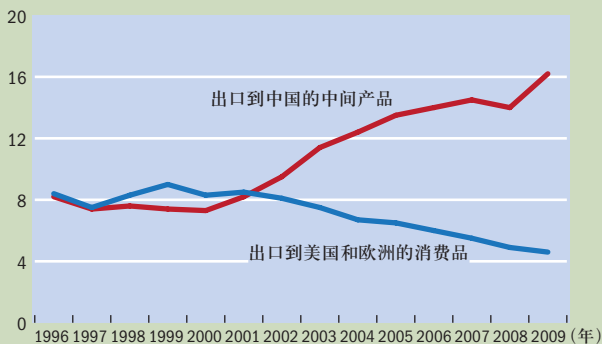
总之，中国对于投资产品的需求比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得更为显著。因此，根据附加值，典型的亚洲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资本品比消费品高出了约30%，这与10年前资本和消费品的比值正好相反。对于亚洲资本品出口的大国——日本和韩国而言——其出口中国产品占总出口量的20%到25%，比10年前提高了4倍。

大宗商品制造商，如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其出口中国的商品量也有大幅增长。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约占全世界的2/3，进口黄豆的数量占全世界的1/2，进口金属的数量约占全世界的1/3。因此，中国的需求不仅仅对亚洲有巨大影响。例如，在非洲，中国的公司已成为矿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投资者。在拉丁美洲，经济周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根据IMF近期预测（2012年），万一中国生产量的急剧放慢（按经济学家的术语叫作“硬着陆”），大宗商品价格将下降到20%—30%之间，并严重影响

如果投入成本能提高到更接近于其他可比经济体的水平，并且资金成本也能与它的高回报相一致的话，这样便有助削弱过度投资的动机。

图3  
聚焦转变

中国的邻国出口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间产品数量增大，同时其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正在减少。  
(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占世界总出口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财政收入和债务水平。其影响的大小将不亚于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对该区域的影响。

但是，区域贸易伙伴必须适应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型的重新平衡。首先，尽管经济增长迅猛，但是中国作为消费品进口国的角色仍有待提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消费品进口量仅占全球的2%。除此之外，中国消费者青睐中国产商品的程度已在日益增加——中国在全球消费品进口量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落后于其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这反映出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外国生产商无法克服的潜在障碍——如创建大型零售以及分销网络——来自本地生产商日益增加的竞争，或者是外国公司逐渐将生产转移到当地，以适应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并更贴近于消费者。无论中国进口消费品的相对减少的原因何在，面向中国的全球消费者需求所占份额的变化并不代表其全球消费品进口份额会相应地按比例增加。但是，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供应商仍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将自身整合到供给国内市场的中国公司供应链中，从而受益于其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 核心地位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供应链枢纽的核心地位，因此亚洲的贸易伙伴也受益于与中国间不断增进的出口联系。当今的中国在该区域进口超过50%的中间商品(用作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其比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倍。过去10年间，除中国外，亚洲各国出口到中国的中间产品量在其总出口量中所占比例翻了一番。这与直接出口到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品稳步下滑的比例正好相反(见图3)。作为供应链的一份子，亚洲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正迅速受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取得的成果所影响。然而，这也意味着亚洲贸易伙伴也将严重面临中国出口下滑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估计中国出口增长下降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亚洲经济体向中国出口增长下降约1/3个百分点。此外，对大多数以出口制造类商品，而非大宗商品为主的亚洲经济体而言，中国出口，而非中国内需，似乎是决定其向中国出口商品量的主导因素。对于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产品出口国，以及东南亚某些相对较小、却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这种与中国出口业绩的关联似乎较为紧密。

另一方面，由于亚洲经济体是通过供应链而相连，因此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角色已被削弱。事实上，衡量中国向主要市场总出口量增加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当以附加值为基础来衡量中国占世界总出口量比例时——根据亚洲其他经济体，计算出直接和间接投入，

中国的主导地位有所减弱。以美国为例，2010年，中国的最终商品总进口量占亚洲的62%，如以附加值计算，其所占比例低于50%。这对更多发达的亚洲经济体意味着任何潜在的竞争加剧，由于中国出口迅速向高科技产品转型，将同样依赖于中国在价值链中捕获更大份额的能力。中国进口商品种类在2005年前逐渐增加——但近年来其增幅比例开始下滑——这种趋势可通过迅速建立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得到加强，同时这样还可使中国在科技密集型价值链中占领大部分份额。除此之外，由于原油和运输成本提高，减少生产链中生产地点的数量将导致所谓的垂直贸易整合的部分扭转。但是，中国工资提高将导致更多的外包和搬迁，考虑到该区域的低收入经济体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此举可能对其有益。

## 不利因素

目前，中国对外顺差迅速下滑可能是中国贸易条件长期恶化，极高的投资需求所引发的稳健的出口增长，以及周期性外部需求萎靡的结果。同时，中国的外部不均衡性正在改善，但人们亦对可能出现的新型内部不均衡性有所担心。因此，如果中国国内不均衡性影响其经济增长，那些受益于中国投资型增长的亚洲贸易伙伴则可能最终将面对出口下滑的局面。考虑到与中国垂直供应链的联系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出口放慢，这些贸易伙伴也将受到影响。对比之下，如果亚洲贸易伙伴可以增加面对中国消费者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那么它们从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平衡中的净收益将更为显著和持久。■

马尔哈·纳巴(Malhar Nabar)为IMF亚洲及太平洋部的经济学家，奥拉夫·恩特罗博拉斯特尔(Olaf Unteroberdoerst)为该部门副处长。

本文根据近期出版的IMF工作报告(12/100)《中国不均衡性的终结?》和2012年4月IMF《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第四章“中国在重新平衡吗?对亚洲的影响如何”编写而成。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2,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Western Hemisphere* (Washington, April).

# 虎与龙

在发展进程中，印度与中国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

穆尔塔扎·赛义德、邬杰明

中国和印度是新兴世界中的两大巨人。两国拥有超过全球 1/3 的人口，即使发展速度不快，它们也会对全球经济走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和印度跃居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列。1995 年来，中国平均收入增加了近 10 倍，而印度的平均收入增加了近 4 倍。尽管政治和经济体系大不相同，两国已使成千上万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均和环境恶化的现象亦在不断加深。考虑到这些变化的规模，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有着深刻的含义。

然而，中国和印度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模式着重于推动对外出口的制造业。印度也在不断地与全球经济融合，在其经济模式下，内需和服务业一直处在相对重要的地位。这一进程演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

中国技术人员在印度普那与印度工人讨论混凝土机械。





印度的经济增长略逊于中国，但是从石油化工到软件的很多领域，印度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包括T恤、空调、iPod配件和家具在内的中国产品几乎已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销售。相比之下，印度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了很多服务，包括其工程师进行了办公流程自动化、其呼叫中心解决软件的故障，其制药公司生产了通用的药物。

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和印度的情况类似——低收入、大量农村人口、几十年来自我施加的经济放逐，以及高度的中央控制——那么两国是如何绘制出其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呢？考虑到这些差异，两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该如何相互借鉴？

## 改革是如何开始的？

中国的改革不是始于修建工厂和吸引游客的摩天大楼，而是通过改变乡村面貌开始的。1978年，依靠集体农场辛苦度日的农民占其总人口的80%。当时，公有土地租借给了个体农户，这些农户被准许自行选择农作物品种并可以在自由市场中出售任何超出国家配额部分的农产品。这些农业改革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并允许大部分经济活动和劳动力摆脱中央计划进而进入工业领域——同时引发了导致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系列变化。随后，在1980年，中国开始通过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来重新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依靠税收自主以及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这些经济特区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投资，而这种改革试验也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地区。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减轻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令其转向新技术领域投资并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扶持下，通过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出口领域的公司学会了高效率的工作方式。通过借鉴日本和韩国信奉的东亚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中国成功地将其过剩的劳动力和全球生产体系联系在一起。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进一步刺激，其总贸易（出口加进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GDP中低于10%的比例迅速提高到目前的近50%，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寥寥无几发展到过去5年期间，每年15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始于1991年的印度经济改革起步稍晚于中国。由于无需着重于产权和缺少政府监管，这些改革起初侧重于收支危机后改善经济的灵活性。首轮改革中取消了对制造和贸易的限制。1991年前，许可要求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全境，工业领域的外国竞争寥寥无几或根本不存在，政府对从运输业到金融业的干预限制了创业和增长。20世纪90年代，很多领域都取消了许可

要求，关税下降，印度的金融市场也对外开放。金融业的流入占GDP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零投入上升到在2007年，即全球经济危机前一年，接近于8%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其中服务业的发展突出。这主要源于其大量训练

## 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可能要终结。

有素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工程师能够将西方的商业模式转化到一个低成本的环境中。服务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由1994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7.75%。始于客户服务和软件编程的简单外包扩大到新商务流程和软件的开发，对基本法律和医疗案件的处理和其他服务。印度也在医药领域等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劈出一片新天地。尽管印度的出口增长尚无法与中国的抗衡，但直到2011年，其出口商品和服务约占其GDP的24.5%，只是略微低于中国的28.5%。

## 当今印度和中国的地位如何？

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以及其更为迅猛的增长使得其收入水平高于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生产的玩具、鞋类、汽车部件和计算机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且其制造业雇用的人数超过1亿。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少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其劳动力市场萎缩，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可能要终结。

过去10年，改革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不均衡。投资由原来占GDP近13%的比例，激增到现在约占其产出的一半；与之对应的是，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已从45%下滑到了35%。如果这种不均衡性持续下去，过度投资可能由于过剩产能加剧、生产力降低和银行坏账增加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恶化。严重的污染和能源需求也对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

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指出，必须为投资和消费寻求更好的内部均衡性以确保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应通过提高资本价格对低成本投资予以补偿，根据国际标准进一步提高其他主要投入的价格（如土地、能源和水）并更好地保护环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聚焦变化”）。中国可以采取两种并进的方式来刺激消费需求——即增加家庭收入和减少家庭

和企业存款：通过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领域增加高附加值领域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通过更为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公平地对家庭进行补偿，更有效地分配资本的金融改革减少家庭和企业的存款。令人鼓舞的是，大部分改革已经在中国政府的视野中，但是否能够及时实施上述改革将至关重要。

在印度，其特征鲜明的服务业为国家带来一些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高附加值领域中涌现出众多世界级的私人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和塔塔咨询（TCS）等公司在世界高端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中角逐。但是据估计，印度信息技术行业的就业仅有250万人，或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0.5%。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仅为1500美元/年。

未来几十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迅猛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将涌入劳动力市场。为这些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无疑将需要进行许多改革。教育和医疗需要改善，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管理需要进行大幅调整。从吞吐量不足的港口、过于拥堵的道路交通到混乱的采矿权和停电——这些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必须得到解决。当然，通过简化规章制度、消除官僚作风和减少对外贸易壁垒对经济环境进行改善也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对金融系统进行改善，以便使更多人能够存款和借贷，并且使公司更易于进行长期投资。

没有持续稳定的改革，就不可能有效地创造就业机会。而这又需要政府和印度联邦储备银行对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进行监管，通货膨胀在近年来已经上涨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预算赤字也一直居高不下，并且可能阻碍投资和抑制资本市场的发展。

## 面对共同的挑战

印度和中国也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尤其是包容性的增长，在两个国家均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在减少贫困方面的贡献史无前例。在印度，在1993年到2009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从36%下降到了22%；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4亿多人口已摆脱了贫困。尽管这些数字令人震撼，但是很多人的生活仍不尽如人意。印度尚存在2.5亿贫困人口，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相当低；在中国，近几年来，农村的生产力停滞不前，公共服务也需调整，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对更高品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需要。

除此之外，两国也迅速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受教

育人群的工资，特别是城市中受教育人群的工资增长远远高于那些贫困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工资增长。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逐渐与发达国家民众的水平相接近，然而城市中产阶级人口与大量生活在农村以及未充分受益于经济迅速发展地区的贫困人口之间的生活差异在两国都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系紧张。

## 相互借鉴

为了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地增长，中国和印度需要调整其经济结构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内外需求以及它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了实现上述的平衡——两个至今采取了不同发展战略的国家——相互借鉴将有助于它们做得更好。

首先，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印度可从邻国更长时间的改革纪录中学习些什么？农业和农村改革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不但将劳动力解放到了工业领域，也激发了对各类工业产品的需求。尽管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了它自身的“绿色革命”，但价格和公共投资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从正在进行的改革中获利，印度需要像中国在它的腾飞初期一样，为农业和工业创造更大的协同效应。毕竟，在印度有半数的工人和1/6的产量依赖于农业。

中国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于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国的投资，这些也顺带刺激了其就业机会的创造。通过允许进口和直接的外商投资进入其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核心的贸易伙伴，虽说固然常常带有某些附加的限制，但却为本国公司创造了针对激烈的外部竞争进行调整的条件。

有助于改革成功的政策包括建立灵活的经济特区和优厚的外商投资体制、支持出口的商业环境和监管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两国改革中均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印度可以向中国学习借鉴，如何开放其国内市场去面对竞争，政府政策如何协助发展制造业和促进就业。

除此之外，作为印度发展改革绊脚石的因素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驱动力：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者，甚至在城镇建造初期就已着手对道路进行建设。中国对出口的重视促使其大力投资货运运输，以及如今的铁路客运、港口设施、机场、甚至是高速公路。中国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已迅速发展，如，上海和北京的地铁已跻身于世界最大规模的地铁之列。中国在能源方面的投资——传统领域的煤炭以及当今的各种可再生能源——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然而，在印度，基础建设却成为一颗绊脚石。政府的直接所有权使得铁路方面的投资变得复杂化。某些机场私有化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港口设施投资却较为滞后，能源生产和运输受落后的定价模式和法规制约而极大地增加了投资成本。这为印度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来协助发展，改善连通性和降低出口成本提供了充分的改善空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可能不会完全或轻易地在其他国家被复制，但是，这毫无疑问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发展目标的捆绑模式展现了生动的一课。



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

此外，中国可向印度学习借鉴些什么呢？印度相对先进的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关键的领域。尽管印度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却拥有高度成熟和透明的股票市场。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开放度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有效地开放存取来自外来者的投资资本。这不仅成为了印度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也将透明度和开放性引入了印度的企业文化中，否则印度公司有可能无法动用外来资金。公司在印度股票市场的上市需要与发达国家相似的透明度。这也改善了大型公司的市场纪律和信用。

两国的金融系统仍以国家为主导，外来投资者的机会仍然有限，相比之下，印度的金融系统更面向市场。银行存款利率的完全开放提高了存款人的回报率。公共银行和私人银行为大公司的生意而竞争，鼓励更为有效及合理的资源配置。相比之下，中国股票市场对外来投资者相对更封闭和不透明。改善对股票市场的疏忽和向外商开放，将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信息的获取以及改善市场纪律及资金配置。而那些无法直接与外资公司建立直接合资的企业也可以更容易地筹集资金。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将产生类似的有利影响，并可以增加家庭财政收入。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正处于重新平衡期，因此也可向印度借鉴发展服务业的技巧。印度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系统尽管尚未完善，但是在较少的政府干预和扭曲下可为公司进行资金配置。同样，由于对其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中国可借鉴印度的“无形人才建设”。通过对职业教育以及出口为导向的科技

园的扶持，印度政府已在某些领域得以发展和保存其优势，而中国也需要这些领域的发展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上述的领域中，印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正确的政策下，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其人口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印度和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加强。自经济开放以来，两国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从拥有大量贫困人口且与外界缺乏联系的状况发展到当今成为了购买力平价中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其不同的经济模

式说明，国家的发展没有单一的模式，中期来看，保持增长将面临各种挑战。

两国仍有很多人生活较为贫困，几乎无法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经济改善所带来的成果。在印度，改善基础建设和开放制造业经济来引入竞争将有助于加快增长，促进经济更全面地发展。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略有经验。在中国，将经济从建设和出口为主导向服务和消费领域转型并使金融体系更面向市场，这将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和扩大其收益。而印度在这些领域已拥有了成功经验。

尽管中国和印度在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在规划下一阶段重大发展的过程中，仍有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学习。■

穆尔塔扎·赛义德 (Murtaza Syed) IMF常驻中国副代表，  
邬杰明 (James P. Walsh) 为IMF亚洲及太平洋部高级经济学家。

# 重返世界经济

缅甸仰光大金寺的人群。



## 缅甸重返世界经济，承诺改善民众的生活

梅拉尔·卡拉苏鲁、谢尔盖·多措钦

处在一个令人吃惊的转机中的缅甸，正摆脱几十年来一直与世隔绝的局面。吴登盛新政府开始了历史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将缅甸重新纳入全球体系并助推其经济发展。

但是在改善缅甸未来发展的道路上，需要其政策制定者坚定地维持改革的势头，并将改革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果。其他国家可根据以往的经验，通过协助其技术和发展对缅甸给予帮助。

### 逐步实施改革

缅甸在政治和解和民主化进程方面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始于2011年3月的政治改革包括释放政治犯、放宽媒体审查制度、通过了承认工会的新劳动法以及与少数族裔达成的几项停火协议。在这些政治进程中，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当选议会成员，而2011年年底，她一直被软禁着。

这些措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4月，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通过补选赢得议会席位后，尽管美国市场仍禁止进口缅甸产品，但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同意暂停针对缅甸的绝大部分经济制裁。

缅甸拥有天然气、宝石、矿产和林业产品等丰富

的自然资源，并且还有大量年轻的劳动力。其东盟成员国地位（2014年缅甸将成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以及毗邻印度和中国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这一全球最为活跃地区的战略桥梁。

随着新的开放政策，仰光的酒店已经住满了前来探寻创业投资机会的外国商人。这些外国商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他们在酒店大厅里开会，身穿西服穿梭在这个城市，“享受着”缅甸的酷热。包括可口可乐、雪佛龙和通用电气等在内的大型外国公司已宣布将在缅甸投资的计划。

人们对缅甸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保持乐观，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不仅在发电机大规模使用的仰光，甚至是在附近建有水利发电站的新首都内比都，停电也是司空见惯的事。道路状况差，金融服务落后，且民众的生活水平仍处于本地区的最低水平。年轻一代缺乏技能，这表明过去几十年间落后的教育政策造成了人力资本的削弱。此外，某些地区仍不时爆发种族和宗教冲突，对改革的进程构成了威胁。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新政府已着手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缅甸的货币缅元自1977年以来正式进入人为低汇率的时代。这种人为造成的低汇率以及对国际支付和转账的限制导致了非正规货币市场的迅速发展，上述非正规货币市场使用几种不同的汇率，且不鼓励贸易和投资。缅甸政府当前计划对汇率体系进行改革，



以促进其与各国间的相互联系。4月1日，中央银行用市场汇率取代固定汇率，使缅元的汇率向广泛使用的非正规市场汇率靠拢。对非正规市场汇率的整合仍需时日，且整合将主要通过消除对国际支付和转账的限制得以实现。为了以现代化的外汇市场来迎接第27届东亚运动会，缅甸政府正对其法律框架和市场结构进行准备，以确保在2013年实现这一重要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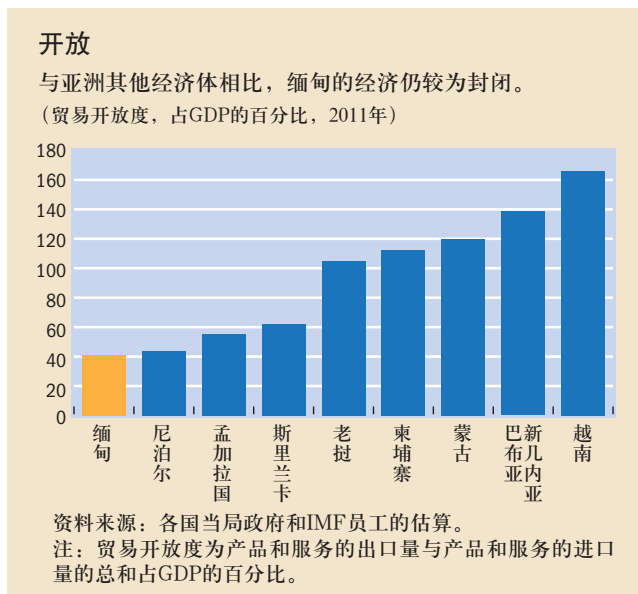
2月，新政府在议会对预算进行了商讨，这是迈向财政透明化的历史性一步。预算计划将医疗和教育支出增加一倍，这得益于天然气方面的高收入，而目前天然气正采用市场汇率进行计价。但是人力资本的改善将会需要长年的大力投入。

针对这些挑战，缅甸政府正起草国家经济计划，以确保在2015年将贫困线下人口比例从26%（近期一项国家调查给出的数据）减小到16%。

新颁布的外国投资法案规定，在无本地合伙人的前提下，外国投资者仍可租用土地和开展业务。新法规还提出了税务刺激政策，以及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鼓励技术转移和创造就业。与邻国相比，缅甸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少，但具有较大的增长潜能。三个特别经济区已被列入规划，它们将拥有高质量的道路、深海港、供电和其他设施，以吸引外国投资于针对出口的轻型制造业。此外，土地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赋予农民，以提高农业产量。

## 前景光明

缅甸的经济状况由于上述措施得到改善。IMF预计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在2012/2013财年将达到6.25%，而在过去5年间该数值仅为5%。预计



通货膨胀将减少至6%左右，较过去10年间两位数的通胀率相比将大幅减小。这主要归功于缅元在平行市场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减少为支持政府开支而印刷的货币数量。2000年发现的Shwe和Zawtika气田将大大增加缅甸的天然气储备，并从2013年起增加其出口额。

但是，缅甸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农业和能源，且较为封闭（见图）。促进其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对于扩大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以及减少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至关重要。例如，对自然资源出口的依赖将使缅甸经济更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大量资金涌入能源部门将导致货币持续升值，进而对其他竞争力有限的出口领域造成破坏。部分风险可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管理——例如，在大宗商品价格较高时，通过财政框架对其所得进行储备，并在价

## 缅甸正摆脱几十年来与世隔绝的局面。

格较低的“困难时期”使用这些储备，这样便可以有助于限制繁荣与萧条周期。

农业和能源以外的可持续和广泛的增长要求对国内私营经济进行扶持，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减少官僚作风；更为持续和透明的政策将有效降低在缅甸从事商业活动所需的成本；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铁路、港口和信息技术都将有助于增强缅甸国内私营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及其发展。

金融体系在对通过改善成千上万从未有过银行账户的缅甸民众的融资获取权而促进该进程方面至关重要。自2010年起，缅甸政府已采取措施放宽对银行系统的限制，但是由于其信贷融资比仅占GDP的8.5%（为该区域的最低比例），因此，加快银行现代化的空间仍然存在。进一步放宽支行扩张的限制相当重要，这将允许银行自行设立存储和贷款利率，并提供适合经济增长所需的金融产品，促进支付系统的现代化。这些措施应与维持金融稳定性的增强监管和法规相结合。与外国银行一起创建合资银行的规划也是促进银行业发展的重要一步，这将有助于2015年东盟金融一体化。

缅甸还需要较为漫长的时间才能彻底地融入世界大家庭，并令其民众受益于这种融合所带来的成果。毋庸置疑的是，缅甸正在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

梅拉尔·卡拉苏鲁（Meral Karasulu）为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副处长，谢尔盖·多措钦（Seigei Dodzin）为该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 获取银行服务

最新的数据库资料表明，人们在存款、借贷、支付和风险管理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口

目前，全球 50% 的成年人未在正规的金融机构（即银行、信用社、合作社、邮局或小额信贷机构）开设自己的账户。这 25 亿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缺乏安全的储蓄场所，获取信贷的可能性也很小。由于没有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他们更难以收取工资、汇款和政府补助。

不过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经济体仍缺乏有关贫困人口、女性和年轻人办理银行业务方式的指标。为弥补这一缺口，世界银行和盖洛普公司 2011 年在全球 148 个经济体开展了一项调查，旨在研究成年人在正规的金融部门内部和外部进行存款、借贷、支付和风险管理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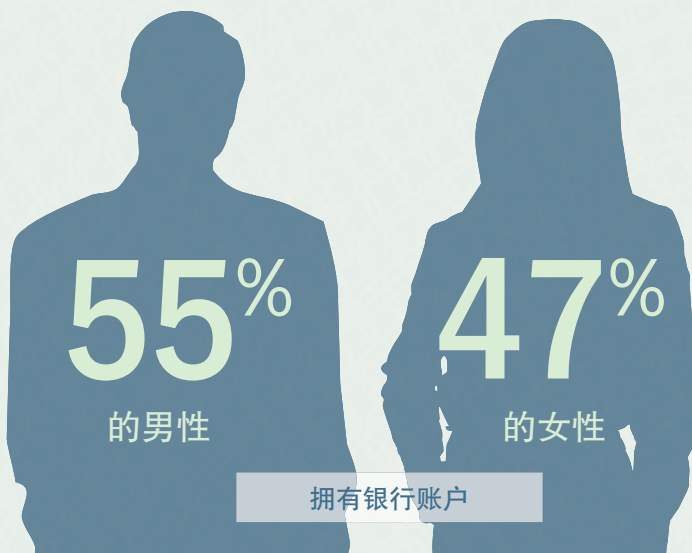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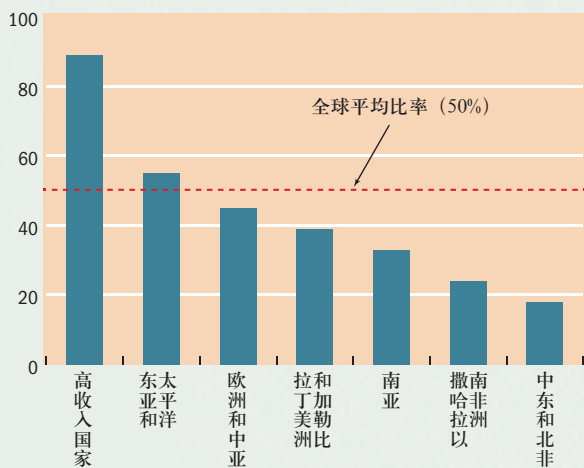
## 巨大差异

诚如所料，数据显示不同地区、国家和特征（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包容性数据库的数据表明，发达经济体 89% 的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 41% 的比例。在最贫困国家中，日均生活水平不足 2 美元的成年人中仅 23% 拥有银行账户。在全球范围内，

55% 的男性和 47% 的女性拥有银行账户。

这些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的最普遍原因包括：没有足够的钱来使用银行账户（65% 的被调查者如此认为），银行账户收费太高或者银行距离太远（25% 和 20% 的被调查者如此认为），以及没有必要的证件（18%）。这些原因表明，消除在物理、制度和金融方面的各种障碍，可以扩大银行账户的使用量及其在金融方面的优势。

全球一半的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  
(在正规金融机构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百分比)



## 储蓄互助社及亲朋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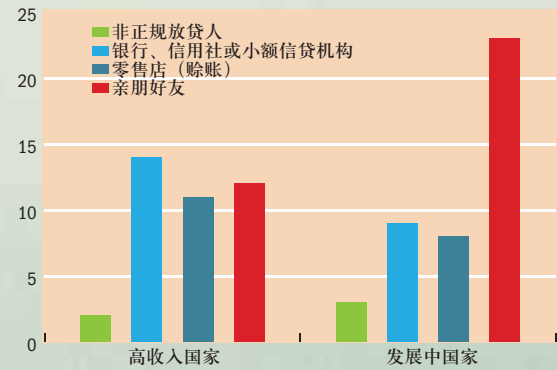
在全球范围内，36%的成年人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存过钱，但仅有22%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是在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存的钱。大约9%的成年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中从银行贷过款，而23%的成年人则从亲朋好友那里借过钱。在发展中国家，基于社区的储蓄互助社(saving club)是银行储蓄的另外一个常见的替代方式(或补充)。这种互助社在西非称之为susu，在秘鲁称之为pandero，其通常的运营方式是将其成员的周存款集中在一起，每周将全部金额拨付给一名不同的成员。

## 移动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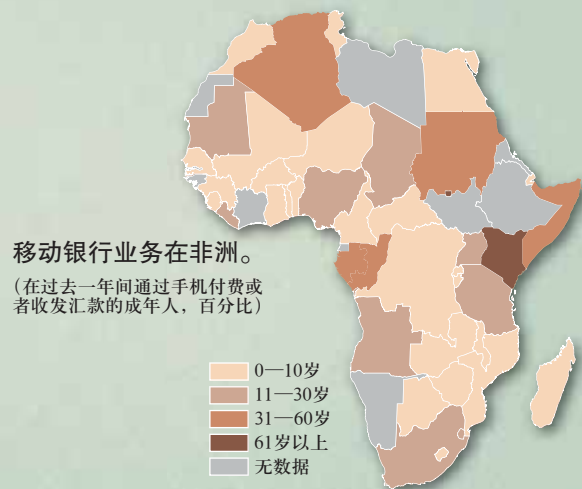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拓展有一个令人关注的亮点，即最近引入的“移动钱包”。尽管很多人熟知肯尼亚的M-Pesa转账系统，但数据显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移动金融方面均取得了成功，该地区16%的成年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曾使用过手机来付费或收发汇款。大约一半的成年人没有银行账户。不过，发展中国家移动金融的全球平均使用比率仅为5%，这表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在引入移动金融方面仍存在管制和其他方面的障碍。■

## 很多人不在银行存款。

(在过去一年间从各种渠道借款的成年人，百分比)



注：借款的渠道很多。



89% 发达经济体的  
人口

41% 发展中经济体的  
人口

9% 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  
间从银行贷过款

拥有银行账户



日本东京街头的上班族。



肯尼亚内罗毕街景。



在Chamroeun小额贷款公司位于柬埔寨Pochentong分部工作的女性。

本文由世界银行金融与私营部门发展网络的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Asli Demirguc-Kunt)和莱奥拉·克拉佩尔(Leora Klapper)撰写。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全球金融包容性数据库，该数据库是根据对全球148个经济体的15万个访谈生成的，其网址是：[www.worldbank.org/globalindex](http://www.worldbank.org/globalindex)。

# 金融业税收

## 很多欧洲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扩大对金融业的税收

杰夫·戈特利布、格雷戈里奥·因帕维多、安娜·伊万诺瓦

包含银行、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一个深入而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可为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公司可以更好地获得其投资所需的资本。长远来看，个人可以更好地使开销在目前和未来更加均衡——在经济景气时为经济不景气及退休作存款准备。通过将拥有大量存款和较少存款的储户联系起来，一个稳健的金融系统可带来长期的增长。

但随着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金融系统也可以让更大范围的经济体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众多因素中，承担过度风险、高杠杆效应以及对短期批发融资的过度依赖，这三个因素的结合触发了发达经济体中许多重要金融机构的重大损失。政府担心的是，如果主要机构一旦破产，那么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为了避开金融界的全系统崩盘，北美

和欧洲政府分别注入了平均3%到5%的GDP来扶持金融业。各国政府也拿出平均值共计17%的GDP来提供担保及其他承诺。尽管

当局一直在避免金融系统的崩盘，但经济危机仍导致了全球的经济萧条并造成累计产量损失约占GDP的25%（IMF，2012年）。

近期，很多欧洲政府将税收引入金融业，以此来收回紧急救援所支出的财政成本。但欧洲政府仍在就金融业的税收在维护金融系统的作用上进行讨论。最终，欧洲委员会向其所有27个成员国提出协调金融交易税这一概念。

针对金融部门的税收有着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当应用到有风险的行为时税收可作为一个纠错工具来减少未来危机发生的几率。其次，金融交易税也可为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以弥补过去和任何未来危机的开销。

由于重点可放在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而非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上，因此税收可对金融机构法规进行补充（Keen，2011年）。当像最低资金需求这样的法规为协助个体机构吸收亏损制造了一些缓冲，税收可向政府提供对系统进行干预所需的资源。长远来看，税收通过从现存资本收集资金来弥补将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从而更为有效地控制损失的分布。

### 消除扭曲

金融业税收可用于消除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近期经济危机的税收体系扭曲。

就如增值税（VAT）不适用于金融服务这个事实可能有助于解释近期金融业的不对称发展。

同样，金融公司，也包括非金融公司在内，可以从其税收中扣除利息，这可能鼓励了其借债，而非股权

融资的过度依赖。

但金融业税收的拥护者希望的不仅仅是减少现有的扭曲现象。他们希望设计一种能够使金融业承受其风险行为所带来社会成本的税收。最近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业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并不局限于那些直接涉及的相关财务交易，而且也会扩展到广泛的社会领域。

## 金融业税收的拥护者希望的不仅仅是减少现有的扭曲现象。他们希望设计一种能够使金融业承受其风险行为所带来社会成本的税收。

这种税收的基本原理与污染税相同：污染者需为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付出代价。

实施上述税收至少存在着两个难题。首先，是否可以对金融业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定义和测量。其次，法规制定者必须识别出造成此系统性风险的市场行为或特征。

专家还未对可操作使用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定义。但是，现已就确定某些系统性风险可能的来源方面取得了进展：

- 规模和相互联系度：因规模过大而不会破产的机构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关系过于复杂（过多的相互联系度使其不会破产）的机构受益于人为的低融资成本，原因在于投资者认为在其无偿还能力时政府将给予援助。这种潜在的补贴刺激了大规模公司的产生。有助于抵消这种补贴的税收——特别是累进税率框架下（利息随应税金额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会减少对系统重要性的刺激。

- 收益和成本的非对称处理：某些金融机构因为规模过大，使得其不会破产且/或因为其有限的法律责任而免受了降价亏损的风险。这种保护刺激了所有企业实体寻求承担过度风险，但企业实体对高度融资的银行极其敏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对超出一定标准的利润实行更高税收。由于某些超额的回报可作为工资支出（包括红利），对超过一定临界值的工资征税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 融资结构：在近期经济危机期间，银行对相对多元化的批发融资（通过借贷来融资，通常是短期内从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融资）和外国融资的过度依赖被指责对更广泛的金融业和经济造成了不稳定影响。对多元化融资的税收将鼓励银行转向更为可靠的融资来源，如存款或长期本地融资。

- 交易频率：有些分析家认为，金融机构对证券的高频交易导致了资产价格上的过度波动或市场泡沫。另一些分析家则认为高频交易是源于受质疑的社会价值。这些专家倾向于直接对上述的交易征税。

通过改变金融行为而降低金融危机可能性仅是金融业征税的目的之一。政府亦希望其有助于弥补未来经济危机的损失。设计一个合理的金融业税收方案来提高财政收入并非易事。通过一段时间，可以将税款设置为一个积聚占GDP的2%到3%资金的缓冲器，这大约是近期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直接成本的平均规模。

但是未来经济危机的规模和成本目前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某些代价要直到经济危机过后才会显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是用于改善政府财政，而不是用于支持更高的支出。

## 税收工具

目前，正在就四种主要类型的税收进行考评：

- 金融稳定贡献税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和一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的简单税收，其目的在于确保行业支付合理比例的直接成本以及解决病态机构——这些可能涉及到它们的销售、转移或清算。除了增加财政收入外，由于该税收一般包括了累进性税率结构以及不含资产净值和抵押的基础，因此它还具有行为效应。这种方式意味着对批发借贷融资进行处罚。为了改变相关市场行为，设立永久的金融稳定贡献税是有必要的。

- 金融交易税（FTT）是对具体的金融交易的价值征收税款，如股权交易。FTT常被提倡为既能获得财政收入，又能同时减少金融交易所带来的高频交易等不良社会影响的手段。但是，如同其他交易税一样，FTT以不可预计的方式通过供应链而发生层叠为某些业务获得较多资金，并且通过减少金融交易规模间接鼓励金融的非居间化（Matheson, 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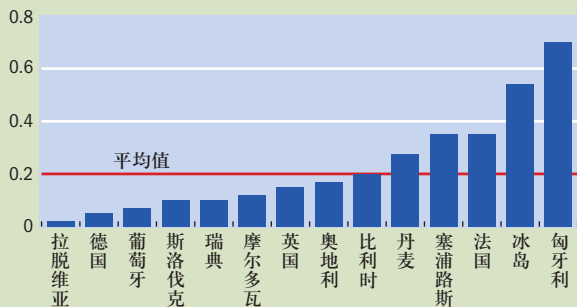
- 金融活动税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利润和佣金。金融活动税实质上等同于金融业中的增值税，普通的增值税并不对金融业征收。它将减少金融业和经济其他行业之间税务处理方式的不同。金融活动税可进一步改善行为效应，如通过对高回报行业加重征税来减少对过度冒险的激励。

- 公司所得税改革有助于减少金融业过高的杠杆率。在大多数国家，税收体系允许公司（包括金融业的公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向贷款人支付的利息，但不能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红利。这就导致了倾向于债务融资的税收扭曲，形成对金融公司引入过度冒险的

## 税款收入

近期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西欧国家立即对金融业征税，规模每年平均在GDP的0.2%。

(金融业税收，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计算。

刺激 (Keen 和 de Mooij, 2012 年)。这种扭曲可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或消除：低股本规则将利息的扣除额度限制到某个临界值之下 (该值可基于最大债务股权比)，综合业务所得税不允许扣除任何利息而公司股权津贴将允许同时扣除利息和股权的名义回报。

## 设计细节是关键

这些税收的最终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具体设计细节的影响。税收方针的设计取决于税收类型，然而一些基本原则应指导大部分的税收实施。

税收范围应尽可能地广泛，仅仅对少数个别机构免税。每个人都受益于金融稳定，而且对某些机构免税会鼓励税收套利，也就是公司改变其类别以便于获得更好的税务待遇。这使税收失去了其意义。更广泛来说，仅对犯规机构征税会产生负面后果机构——如含蓄地揭示那些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机构，这会向市场发出这些机构将受政府援助的信号。

税收的合理征税基准取决于其目的性。如果官方机构正在试图实行纠正行为，对资产负债表 (如批发融资)、损益表 (利润和补贴) 中的某一项或一项交易 (短线交易) 征税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基本原则，则应当权衡各种税收和法规要求对银行的整体影响。

适当的税率将取决于税收类型。为使金融稳定贡献产生行为上的影响，对风险较高的机构税率需较高。对于基本金融活动税应参照商品和服务的通行 VAT 税率。但如果金融活动税的目的是防止承担过度风险的话，则应设立相对高的税率。FTT 税率必需处在低水平以最小化扭曲。即使这样，FTT 本身的层叠效应将使得它难以避免高昂的有效负担。

IMF 在对 20 国集团的各先进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

的报告中指出，金融业税收应确保该行业对未来的任何政府援助承担其直接的财务开销，减小失灵的可能性和破坏性，使其容易执行和并解决可能导致金融界稳定性恶化的现存税务扭曲。在此宗旨下，该报告建议设定金融稳定贡献税，为薄弱的金融机构建立可靠有效的解决机制。如需要其他财政收入，除了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以外，还可以在金融机构的总利润和酬金之上征收金融活动税 (IMF, 2010 年)。

## 实施情况

欧洲很多国家在经济危机后迅速采取对金融业征收税款的措施。约十几个国家实施了与金融稳定贡献税类似的税收，其主要目的在于筹集财政收入。这些国家中大约有一半建立其金融稳定贡献税是一个暂时举措，至少初衷如此。金融稳定贡献税的税率相对较低，且不会产生重大的行为效应。一般而言，这些税务的税款筹集能力基本约占 GDP 的 0.2%，这意味着需要花 15—25 年时间才能产生出与近期经济危机直接损失等同的资源 (见图)。逃税与否，或如何对这种筹集造成影响目前尚未明了。至今，FTT 和金融活动税在欧洲相当罕见。但是很多国家一直实施“微型”FTT——如英国本地注册股本的印花税——但过去几十年来股票交易税已经变得不受支持 (Matheson, 2011 年)。2011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在其 27 个成员国中提出协调性 FTT。此税收议案有意于 2014 年正式生效，这将确保金融业协助减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积累，同时试图阻碍那些无法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交易活动。

欧盟委员会提议的征税基准将包括所有金融机构间的交易，且至少交易的其中一方是欧盟 (EU) 成员国。该基准将覆盖约 85% 的金融业交易。个体和小型企业从事的房屋抵押、银行贷款、保险合同和其他金融活动被免税。

不同交易类型的税率将有所不同。例如，对于那些涉及买卖股票和公债的项目，税率为 10 个基点 (1 个基点为 0.01%)。涉及衍生工具合同的交易需承担 1 个基点，但是由于交易双方均需支付税款，因此有效税率将翻一番。对于回购 (repo) 合同——一方采取变卖证券的方式获取资金，并同意在特定日期将证券买回——其有效税率将变为 4 倍。每个回购合同都涉及 4 个应税交易。该税收的年预期收入——约为 GDP 的 0.5%——由欧盟及其成员国共同分享。

到目前为止，FTT 提案并未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且欧盟大多数成员国也并未明确对其表示支持。4 个欧盟国家已表达了很大程度的担忧，而其他 9 个成员国则对其予以支持。法国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单方引入一个临时 FTT。无论交易是在法国境内还是境外实



施，对法国上市股票其税率均为 0.2%。对仅在法国进行的金融活动，将对涉及高频交易的运营和不以对冲为目的的 EU 主权债券的信贷违约掉期，且征收 0.01% 的 FTT 税率。

尽管欧洲并未对 FTT 达成一致协议，但由于欧洲在展望货币联盟未来的同时正试图解决因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该提议很可能仍保留在欧盟议程。特别是，尽管遭到很多成员国的反对，但欧洲议会已决定拥护在欧盟内采用 FTT 的一项提案。在 2012 年 6 月的欧盟峰会中，欧元区四个最大国家已承诺采用 FTT。■

杰夫·戈特利布 (Geoff Gottlieb) 为 IMF 欧洲部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奥·因帕维多 (Gregorio Impavido) 和安娜·伊万诺瓦 (Anna Ivanova) 为该部门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0, "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by the Financial Sector," *Final Report for the G20* (Washington, June).

———, 2012, *Fiscal Monitor: Balancing Fiscal Policy Risks* (Washington, April).

Keen, Michael, 2011, "Rethinking the Tax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 57, No. 1, pp. 1-24.

———, and Ruud de Mooij, 2012, "Debt, Taxes, and Banks," *IMF Working Paper 12/4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theson, Thornton, 2011, "Taxing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ssues and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11/54*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3-2014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3.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1, 2013.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s\\_programs/pepm](http://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s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http://www.sipa.columbia.edu)

# 燃油风险

##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能源补贴会令其财务状况面临很大风险

大卫·考迪、瓦伦蒂娜·弗拉米尼、马蒂亚斯·安东尼奥

自2008年年底起的国际石油价格迅速反弹再一次暴露了很多补贴燃油价格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财务风险。两年前一篇文章《金融与发展》的文章预测，如果国家继续限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本国消费者的转移，燃油价格补贴将进一步抬高（见“石油补贴：代价高昂且持续上涨”，《金融与发展》2010年6月号）。

这些风险如今变成了现实。

自2008年年中的价格达到峰值后，国际原油价格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持续暴跌。但暴跌价格大部分如今已反弹。过去3年间原油价格持续的上涨已使2011年年底原油价格回升到2008年年中价格峰值的80%。自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波动。

在国际原油价格猛涨到2008年年中峰值期间，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直努力减少本国消费者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在过去3年，大多数上述国家的价格传递率都低于70%（见图1）。原油出口国价格的传递率较低，约一半的国家——主要是中东和

中亚国家——其价格传递率低于55%。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和欧洲新兴国家的价格传递率要高得多。

### 高额财政损失

对许多国家来说，不完整的价格传递是一项巨大的财务风险（见图2）。例如，对中东和中亚半数国家而言，其成本在2011年年底超过了GDP的2.3%，而对半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其成本超过GDP的1.3%。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期间，造成低价格传递率的部分原因是由于2008年年底很多国家的燃油税相对较高。由于2008年下半年原油价格开始下滑，为了弥补税收损失，很多国家几乎没有把原油价格的下跌转移到本国消费者身上，在此期间，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价格传递率均低于30%。价格反弹后，那些税收标准高于历史限额的国家纷纷降低税收标准以防止国内价格迅速上涨。

过去3年里，很多低价格传递率国家的税收水平仍然较高，只要未来国际价格变化能够完全转移给本国消费者那么这些国家就仍将保持其高税收水平。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正面临着目前税收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状况。但是，很多减低传递率的国家已达到低税收水平，需要降低税收来进一步抑制价格的上涨。而其他国家正在对燃油消费者进行补助。

下降的税收水平和上涨的价格补助正困扰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部分国家，这些国家的燃油税是公共支出的重要财政来源，并对减低贫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教育、健康和基础建设）。约有半数的中东和中亚的国家一直有补助消费者的传统并仍在进行。其他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也在对其消费者进行补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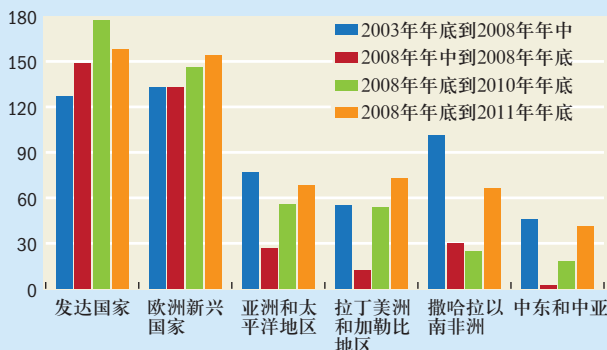
20国集团的某些成员国，不管是先进经济体的还是新兴经济体，也在对其消费者进行补助，而这与2009年9月匹兹堡公告的承诺是相悖的，公告中呼吁

图1

### 吸收增长

很多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并未完全将近期燃油价格上涨转移给本国消费者。

（传递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计算。

注：价格传递率是由国内价格上涨除以国际价格上涨得出的值所表示（均采用当地货币进行计价）。



中国重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在调整汽油价格。

淘汰“低效率的化石燃料补贴”。重新致力于消除这些国家的补贴有助于在别的地区推动类似的改革。

## 政治敏感性

消除补助可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价格补助会刺激更高的燃油消费和更多的浪费——例如，很多石油生产国的原油零售价是全球最低的，这就导致燃油消费（以及与其相关的拥堵和污染）水平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同时，这也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补助可能导致边境走私和国内短缺。这些国家的高财政损失限制了高优先级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资，而且大部分补贴由高收入群体获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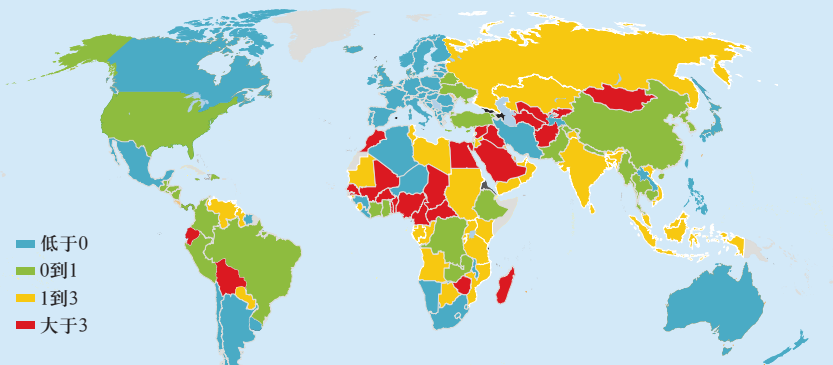
但是补助仍在持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缺乏改革信用度，以及价格上涨对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民众通常不相信政府会动用预算存款来造福广大民众。

图2

### 高预算的碰撞

财政损失对于那些缓和燃油价格上涨国家可能相当高。通常政府会通过降低燃油税来减少价格上涨的影响。

(财政损失，占GDP的百分比，2008年年底到2011年年底)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计算。

注：将按2008年年底的税率与按2011年年底的税率所得的年度净税收收入相比较，计算得到财政损失的值。

石油出口国中，公众通常视廉价能源为石油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同样的，尽管高收入群体能从低原油价格中获取大部份利益，补助改革仍可导致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以及产生更多的贫困人口。

过去的燃油补贴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项强调燃料补贴弊端并将补助改革与优先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公共宣传活动将有助于增加改革所需的公众支持。

公正地纪录补助幅度是这一进程的关键组成部份。这个改革策略已在一些国家得以实施并成功地减少了燃油补贴，这其中包括加纳、印度尼西亚和约旦。最近，价格一直处于世界最低油价之列的伊朗已开始逐步提高其国内的燃油价格，并引入近乎全民性的拨款项目以减少对民众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伊朗也启动了对能源密集型领域的扶持从而为节能技术提供资金。

在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体制下，可以在控制财政成本的情况下，扩大这些项目的预算，解决贫困问题。对于那些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不那么健全的国家来说，以财政情况允许为前提，最好采取一个渐进的改革手段，以待社会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加强。

## 防止复发

为了避免补贴的再次发生，因此应充分放开燃油价格。但是在此期间，国家可采用成品油自动定价机制，确保将国际燃油价格变化完全转移给本国消费者。这种机制在博茨瓦纳、智利、利比亚、南非、土耳其和津巴布韦等国家运转良好。

但是，采用自动机制也并非万全之策。很多国家采取了上述机制，但在国际原油价格迅速上涨时又放弃实行。自动机制的脆弱性局部反映出了政府不情愿将大幅上涨的燃油价格完全转移到本国，由于政府认为原油价格上涨是暂时性的，并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些担忧可通过将价格平稳原则（如设定国内燃油价格变化幅度上限）引入自动机制来消除，以此确保中期内将国家原油价格变化完全转移，而又避免了国内价格的大幅上涨。■

大卫·考迪（David Coady）为IMF财政事务部副处长，瓦伦蒂娜·弗拉米尼（Valentina Flamini）为该部门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安东尼奥（Matias Antonio）为该部门研究助理。

# 井然有序

## 将数据表拼图中的“遗失部分”连接上将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危机

艾迪尔海德·伯基-施梅尔茨、阿尔弗雷德·M.莱昂内

在分析经济趋势和事件时，掌握正确可靠的数据至关重要。缺少了这些数据，对未来经济方向的预测或对过去发生经济事件的解释，就像拼图中缺少了某些拼版而不完整。“数据缺口计划”将有助于填补部分空缺，并提高全球经济学家使用的数据的质量。

数据缺口计划由20国集团(G20)发起，着重通过提高数据收集的方式，填补数据缺口，这其中也包括IMF负责的经济和金融数据。这样做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找出其主导因素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数据缺口计划利用各成员国的相对优势，成为各国际机构在一系列经济和金融统计上共同努力的催化剂，并进而消除国际统计蓝图上的诸多盲点。国际机构间这种合作和协调的加强，完善了数据的分享，通过避免重复投入而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各国的上报负担。

### 连锁危机响应

经过4年的努力，对现有数据的改善实施方案已就绪，且一部分改善方案已在某些G20国家开始实施(分别见“援救计划的数据支持”，《金融与发展》2009年3月号 and “查找新数据”，《金融与发展》2010年9月号)。在其他领域，大量的工作正在展开，这其中包括针对家庭、金融和非金融公司以及政府的行业账目；有关国际债务票据、国际股票和国内证券的证券统计；房地产的价格。有关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工作，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

数据缺口计划实施几周来，经济和金融统计机构间组织(IAG)成立，并启动了全球主要指标网站www.principalglobalindicators.org。该网站应用了IAG成员国数据，即国际清算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欧盟统计局、IMF(作为主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并几乎立即得到了普及。数据缺口计划继续向网站引入新数据或扩展数据集，例如近期添加的季度和年度G20增长率数据集。

### 多重数据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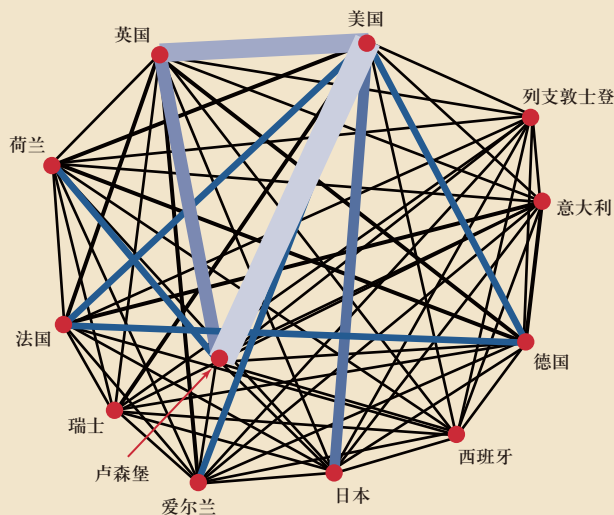
通过改善现有统计框架(包括增加所涉及国家的范围和增加信息颗粒度)和培养开发新统计框架，数据缺口计划意在填补数据缺口，从而协助对金融体系中由国内和跨国界的互联而产生的风险积聚的评估。

当前，不同国家和部门间如此紧密联系，以至于很难对这些关联进行追踪并确定谁将受经济事件影响(见图)。例如，由于通过银行而进行的金融活动数目远低于10年前，因此几乎一半的财务风险保持隐蔽。传统意义上讲，风险主要意味着银行风险。但是通过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些风险可以更大化且/或有所区别。目前，需要通过更好地掌握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公司的信息来对银行业统计数据数据进行补充，变得越来越急迫。其重要性已经陡然上升，但是金融

#### 相互关联的世界

美国、英国和卢森堡的经济联系尤为紧密。

(与其他国家有着最多联系的国家)



资料来源：立博咨询(汤姆森路透)；IMF员工的计算(2010年)。  
注：粗线意味着两国之间的接触更多。

系统稳定性的意义尚未完全明了。

数据缺口计划的另一目的在于有效捕捉跨部门的动向。这不仅可以为政策分析提供充分信息，也可以为经济统计提供良好的组织结构。这种框架使得不同领域不同数据集之间的互相连接成为可能，这些领域包括证券、政府金融和国家的国际投资地位等。对于政府金融统计而言，数据缺口计划开发出一个国际机构数据采集模板，该模板有助于各国上报数据，并有助于提高不同国家间数据的可比性。

## 数据应用

正在持续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严重的数据缺口加深了为确保国际金融的稳定性，在相关宏观和金融政策的设计、实施和监控方面进行高质量统计的必要性。因此，在 IMF 进行常规监管和分析各国经济及其金融部门时，向它提供最新数据是理所当然的。

与此目标相一致，2010 年，IMF 批准根据数据缺口计划对其数据标准进行加强。从 2010 年起，IMF 鼓励使用金融健全指标；到 2014 年，在季度国际投资头

寸中将强制推行由 IMF 制定的向公众公布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全球性基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 (SDDS)。除了以上的新增措施外，今年年初，IMF 还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也就是扶持了一个新的最高等级的数据发布标准 SDDS+，即为数据缺口计划中添加在实际工作中被证实为必要的的数据分类（见表）。对于签署 SDDS+ 的国家而言，新数据分类将在 2019 年变为强制实施。

## 合作是关键

数据缺口计划在国际组织和统计机构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统计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IAG 季度会议或视频会议为这一进展的取得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以及近年来由各国高级官员参加的年度会议对 IMF 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向 G20 作的关于数据缺口计划的年度报告贡献了重要的数据。

2010—2011 年间，IMF 工作人员对 G20 成员国进行了拜访，以讨论他们通过各个国际组织收集和提交的经济和金融数据。2012 年，四个地区性会议在墨西哥、土耳其、法国和中国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国家如何在数据缺口计划提出的缺口弥补上取得了进展。如同与会人士所说的，“数据缺口计划有益于同步所有相关机构间生成和使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换言之，我们正同心协力。这是个小变革。但是如同所有变革一样，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它的步伐和引导其进入下一个高产量的阶段。

## 初具雏形

数据缺口计划的成绩已成为面对现有挑战的坚实基础。这些挑战包括在对行业账目实施改善；增加对隐蔽银行和跨境地位以及金融和非金融公司流向等方面的了解和数据掌握；完成对金融体系风险主要监测指标的发展工作，包括尾部风险、总量杠杆和偿还期失调。同时，在相关官方机构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数据分享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尚不能沾沾自喜。事实上，IMF 正加强其技术援助和培训实力，以协助其成员国巩固数据缺口计划所带来的益处。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做到井然有序。■

艾迪尔海德·伯基-施梅尔茨 (Adelheid Burgi-Schmelz) 是 IMF 统计部主任，阿尔弗雷德·M. 莱昂内 (Alfredo M. Leone) 是该部门副主任。

### 加强起来

SDDS+ 对 SDDS 补充了 9 类新数据分类。

数据分类	SDDS	SDDS+
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实际和关联价格	X	X
生产指数	X	X
行业资产负债表		X
劳动力市场	X	X
价格指数	X	X
一般政府运营		X
一般政府总债务		X
中央政府运营	X	X
中央政府债务	X	X
存款性公司调查	X	X
中央银行调查	X	X
其他金融公司调查		X
利率	X	X
金融稳健指数		X
债券		X
股票市场	X	X
外汇储备调查中货币组成参与度		X
支付差额	X	X
官方储备资产	X	X
国际储备和外汇流动性模板	X	X
商品贸易	X	X
国际投资地位	X	X
协调组合投资调查参与度		X
协调直接投资调查参与度		X
外债	X	X
汇率	X	X
附录：人口	X	X

资料来源：IMF。



# 什么是货币？

没有货币，现代经济就无法运转

伊雷娜·艾斯门德逊、希达·欧纳

就像歌曲里唱的一样，货币可以让世界运转。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接触过货币，其中很多人每天都会接触到货币。不过，尽管人们对货币并不陌生，但可能很少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你究竟是什么才是货币，以及货币是如何运作的。

简而言之，货币有以下用途：

- 价值储藏，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价值储藏起来以供未来使用——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均衡地购买；
- 价值尺度，即提供一个共同的价格基础；
- 交换媒介，人们可以藉此实现相互之间的买入或卖出。

想搞清楚货币的作用，最简单的方法也许就是考虑如果没有货币将会发生什么改变。

如果没有货币，我们的社会将会退化到易货经济时代。人们想购买的每一项物品都必须用自己能提供的物品来交换。比如，一个专门从事汽车修理的人想要交换食物，他就必须找到一个汽车出现故障的农民。但是，如果这个农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修理该怎么办呢？或者如果这个农民只能提供给汽车修理师鸡蛋，而鸡蛋数量大于他能合理使用的数量，这时又该怎么办呢？必须找到特定的人进行交易，这使得专业化很难实现。人们可能在找到合适的易货人之前就饿死了。

但是如果有货币的话，你就不必找到那个特定的易货人。你只需要一个可以销售你的货物或服务的市

场。在这个市场中，你不需要交换个人物品，而是用货物或服务交换一种共同的交换媒介——货币，然后用货币从另一个接受同样交换媒介的人手里交换你所需的物品。随着人们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产量的提高也就更为容易，这就会导致更多的交易需求，并进一步导致对货币更多的需求。

## 多种货币

换言之，货币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地拥有价值，可以很容易地转换为价格，并且被广泛接受。从古至今，很多不同的东西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其中包括贝壳、大麦、胡椒、黄金和白银。

起初，货币的价值是由它的其他用途和替代成本决定的。比如，大麦可以食用，胡椒可以用来给食物调味。人们认为这种用途所具有的价值就成了其价值的基础。人们可以种植更多大麦，但是这需要花费时间，所以如果大麦被消费掉了，货币的供应量就会下降。另外，很多人可能想用草莓作为货币，并乐于换取草莓，但草莓不能很好地当作货币来使用，因为它们会腐烂。草莓很难储存到下个月使用，更别说下一年了，并且几乎不可能用来跟远方的人交换。同时，还有可分性的问题——并不是每种有价值的物品都能被很容易地分割，单位的标准化也很难实现，比如一篮子草莓相对于其他物品的价值不容易确定并保持不变。不仅草莓不能很好地被当作货币使用，很多物品都不能。

但是贵金属似乎全部满足了这三种需要：稳定的价值尺度、持久的价值储藏以及方便的交换媒介。贵金属很难获取。世界上贵金属的供给是有限的。它们持久耐用，能很容易地分割为标准的硬币，并且制作成更小的单位时并不损失其价值。简言之，它们的持久性、供应的有限性、高替代成本以及方便携带性使得贵金属比其他物品更适合于作为货币。

直到近代，黄金和白银一直是人们主要使用的货币。黄金和白银很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把贵金属存在银行，然后用代表黄金或白银所有权的纸币来进行买卖要比实际携带这些贵金属更加方便。想要贵金属的人可以到银行取出纸币所代表的贵金属。最终，代表贵金属的纸币与贵金属脱钩。当两者脱钩



之后,法定货币就诞生了。法定货币在物质上毫无价值。它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一个国家集体同意赋予它价值。简言之,货币能发挥其作用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作用。随着交换方式的演变,交换主体也在演变——从易货贸易中的个人,到大麦和贝壳作为货币时的普通大众,再到近代的政府。

尽管使用标准化的硬币或纸币易于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系统中货币的数量在确定价格方面也很重要。比如,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持有货币至少有两个原因:交易需求(现金预付款)和预防需求(预防性

## 简言之,货币能发挥其作用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作用。

储蓄)。假设冬季将至,这个农民想要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之需。如果农民很难找到想买小麦的人,他可能只好接受用谷物交换较少的硬币或纸币。结果,货币供应的紧张导致小麦价格的降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黄金去铸造新货币。当价格整体下降时,我们称之为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如果流通的货币较多但对货物的需求却是一样的,货币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此时,购买同样的商品或服务需要更多货币(见“什么是通货膨胀?”,《金融与发展》2010年3月号)。保持货币的需求和供应量的平衡可能会十分棘手。

### 货币是如何计量的

在官方统计中,经济体中货币的总量一般是根据广义货币来计量的,广义货币包括所有能提供价值存储和流动性的物品。流动性是指金融资产在短时间内可以按照接近完整市场价值出售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们易于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货币,比如现金。尽管所有国家都把货币和可转让存款(狭义货币)包含在广义货币中,还有另外的物品也能提供足够的价值存储和流动性,也可以算做广义货币。IMF(2000年)表明下述几种形式也被视为广义货币:

国家货币(一般由中央政府发行)。

可转让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可以通过支票和汇票转让);银行本票(在作为交换媒介使用的情况下);旅行支票(在用于与居民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其他通常用于支付的存款(比如外币存款)。

其他存款,比如不可转让的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存在银行的资金),或者回购协议(在协议中一方出售证券并承诺以固定的价格购回)。

除股票之外的证券,比如可流通的定期存单和商业票据(主要是公司借据)。

## 制造货币

法定货币比贵金属使用起来更有效率。调整法定货币的供给并不依赖于贵金属的数量。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它自身的并发问题:正是因为贵金属的数量有限,赖以发行的票据的金额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黄金或白银来支撑货币,政府怎么知道该印制多少货币呢?这就陷入了政府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有关当局总是忍不住去发行更多的货币,因为这样政府可以购买更多的货物,雇佣更多的人,支付更多的工资,并增加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印制更多的纸币会推动价格上涨。如果人们开始预期价格会继续上涨,他们会更快地提高自己的价格。除非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预期,否则,对货币的信心将会瓦解,货币可能最终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时发生的事情。为了消除这种恣意滥印纸币的诱惑,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把决定印制多少纸币的任务委托给独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根据对经济需求的评估来决定印制多少货币,并不向政府转移资金以为其支出埋单(见“什么是货币政策”,《金融与发展》2009年9月号)。“印制货币”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误称,因为今天大多数货币都是以银行存款而非纸币的形式存在(见专栏)。

## 信心会消退

经历过高通胀的国家都曾亲身体会到,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信心。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对价值的侵蚀非常迅速,阿根廷和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他们开始使用另一种更加稳定的货币——美元,作为实际的流通货币。这种现象被称作非官方的美元化,或者实际美元化。政府失去了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并且美元化很难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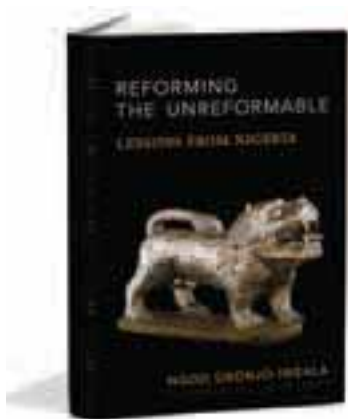
政府用来恢复对货币信心的一些政策很好地阐释了“信心”在货币运作中发挥的作用。比如,在土耳其,政府重建了货币里拉,而里拉在2005年曾消除过6个零。一夜之间,1000000里拉变成了1里拉;而巴西在1994年引入了新的货币——里尔。在这两个国家,公民们都接受这种政策,这表明只要每个人都认同将一种不同的面额或新货币作为标准,它就会成为标准。就像法定货币,如果被接受为货币,它就是货币。■

伊雷娜·艾斯门德逊(Irena Asmundson)和希达·欧纳(Ceyda Oner)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0,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 (Washington).*

## 两面的转机



恩戈齐·奥孔约·伊韦拉

### 知难而进的改革

来自尼日利亚的经验教训

MIT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12年，202页，24.95美元（精装）。

本书中，恩戈齐·奥孔约·伊韦拉（Ngozi Okonjo-Iweala）行长讲述了尼日利亚走出经济波动、基础设施和体制失调、贫困蔓延的不利局面，而逐步实现更大稳定性的经历，可谓非常独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处于这一过程最前沿的尼日利亚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故事。

本书的内容记述相当详实，以很强的可读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见解并坦率地描述了她在2003—2006年间担任财政部长时，其经济团队所面临的挑战。她分析了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在其两届任期内实施的宏观经济改革的积极但不太明确的成果。她的讲述公正客观，不掺杂个人感情。她认为奥巴桑乔有先见之明，分析了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优点和失误。在讲到一些人如何想方设法让她出错或者在这一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时，她展现了非常优雅的风度。

当时，批评人士普遍认为，由于石油财富的“诅咒”、军国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腐败，尼日利亚无法走出经济衰退。但奥孔约·伊韦拉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到2007年，尼日利亚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翻番达到6%—7%，并开始重建教育和卫生系统。她证明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与对公民福祉的关切所形成的合力可以成为改变经济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奥孔约·伊韦拉为改革者总结了尼日利亚的经验，她认为一个经济团队需要遵循一个既定的行动纲领，需要有效的沟通，还需要重点突出并以结果为导向，同时赢得公民社会和大众的支持。她指出，国内领导层的政治意愿是很重要的。但是，尼日利亚的转变有两个方面：它也需要战略援助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例如，巴西商人阿毛里·比尔告诉她组建“一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经济团队，他们团结一致，能打硬仗”，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建议，宏观经济改革战略可以打开通向成功探讨债务减免的大门。

奥孔约·伊韦拉强调非洲历史对经济改革战略设计的相关性。尼日利亚因石油引起的经济噩梦以及恢复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古老的民族和文化/宗教社会史，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史，1967—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以及随后25年的军人统治，农业和社会的大量消减。但她认为治理总是非常重要的。

成功的措施包括减少预算过程的泄漏，执行以油价为基础的财政法规，使预算更加透明，到2006年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加外汇储备，降低通货膨胀率和贷款利率，并实现7%的增长。2003年，奥巴桑乔政府开始了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自由化。

最大的挑战是改革公务员制

度，以提高服务质量、使养老金合理化，消除围绕着贸易、关税和海关的腐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务员允许精英人士转移政府机构的收入，以此补充他们微薄的薪水，用这些收入提升他们作为区域施主的地位。奥孔约·伊韦拉在2006年突然从财政部长调职为外交部长就是因为她不愿意纵容政客们动用大米进口的税收滥用权力来培养对政党的忠诚度。

这个由尼日利亚观察家讲述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在非洲社会启动宏观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因为非洲社会的各个政治阶层都从资源管理不善、资金流动、农业崩溃、教育缺失和公民贫困中获得利益。奥孔约·伊韦拉讲述了打破政客对石油收入的控制并推动尼日利亚走向稳定、多元、以市场为导向、对社会负责的经济治理是多么艰难。

奥孔约·伊韦拉在结束四年的世界银行工作后，于2011年返回尼日利亚，担任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政府的财政部长。她在故事结尾展望未来，认为尼日利亚的成功可以帮助改变非洲。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改革是否将持续，是否会使得尼日利亚经济持续增长，如果是这样，它们能否成为其他非洲国家的榜样？接着，她重新谈到国际社会支持和监督的重要性以及尼日利亚承诺将继续致力于反腐败斗争，加强宏观经济框架，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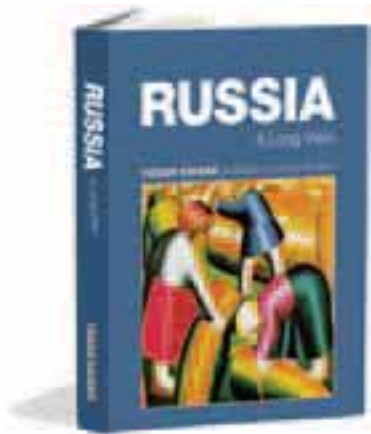
我们还是要问：“这会持续下去吗？”

格温多林·迈克尔  
(Gwendolyn Mikell)

乔治城大学人类与外交学教授



## 宏图



叶戈尔·盖达尔

### 俄罗斯 长远的眼光

MIT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12年，525页，39.95美元（精装）。

叶戈尔·盖达尔，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正是这场改革缔造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学者，本书充分展示了他的作家和学者素质。

该书的俄文版于2005年出版。本书专注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性质并极大地丰富了对俄罗斯经济是否需要现代化的这一辩论。本书的英文版省略了有关俄罗斯政策的某些细节，但增加了一个简短的结语，这篇结语是盖达尔在2009年去世前不久写就的，所以本书中只有1/3的篇幅是有关俄罗斯的。

盖达尔首先大致回顾了世界历史，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到罗马和希腊的城邦时代，然后是静态的农业和游牧社会，再到欧洲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章节，讲述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变革的观点，另一章有关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

和相应的社会调整。书中有关俄罗斯和苏联的经济史的章节是全面的、均衡的。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侧重于“后工业世界”的问题，主要是西方经济体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源头包括人口老化和衰退、政府规模、福利制度的制约因素、国家养老金成本高企、公共教育质量、成本上升导致的医疗融资、腐败以及经济改革的政治斗争。在分析这些问题时，盖达尔总结了俄罗斯的经验教训。

其结果是粗线条的，比较简略。（事实上，该书俄文版的副标题是《经济史概述》）。但它牢牢根植于盖达尔广泛的阅读中，大量的尾注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盖尔达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远远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范畴。写作时，他比现代经济计量史学家融入了更多熊彼特、马克思或库兹涅茨的精神。

## 俄罗斯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

不过，他也巧妙地利用统计证据，例如过去几年当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当时，两者的对比。无论在对待统计、政治哲学还是历史争议上，曾担任记者的盖达尔的文笔始终是清晰而生动的。

这里简要说明一下盖达尔的结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技术决定了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制度会发生改变。（盖达尔对这一点加以强调可能是为了为其观点增加马克思权威性的烙印，因为其观点认为俄罗斯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这在俄罗斯是不受欢迎的。）当从大众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并用于消费或战争的上层人士的力量不断削弱，而其他人能够保留其投资回报之前，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增长并不显著。现代经济增长始于欧洲的城邦商业、

地理发现、金融体系萌芽以及更加保险的财产权。文化因素在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某些文化中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可能会阻碍公平交易关系的发展并导致裙带资本主义。

苏联的经济崩溃是因为它不鼓励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压榨农业并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来支持其低下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下跌引发了经济危机。盖尔达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的转型性衰退和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特定的改革措施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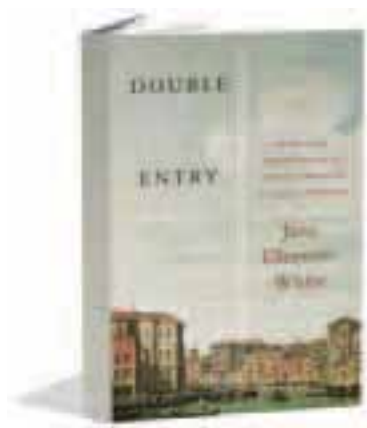
以下是盖达尔总结的一些针对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它必须鼓励移民以补偿人口自然下降，提高退休年龄并鼓励私人养老金。他说，增加政府规模的余地不大。国家应该支持卫生体系建设以达到一个基本

的医疗水平，超出的成本应该由保险支付，鼓励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中引入市场机制。俄罗斯必须将目前的管制式民主制度——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改革和腐败丛生，转变为鼓励改革的积极民主制。

总之，盖达尔的建议反映了有关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某些保守观点。他运用技巧和博学说明他的观点。

约翰·奥德玲·施密  
(John Odling-Smee)  
IMF 欧洲二部  
(包括前苏联) 前任主任

## 借方和贷方



简·格里森-怀特

### 复式记账法

威尼斯商人如何创建现代金融

W. W. Norton & Company, 纽约,  
2012年, 304页, 26.95美元(精装)。

在这本可读性非常强的书中, 简·格里森-怀特生动地描述了复式记账法的诞生和发展。在介绍完现代会计起源后, 格里森-怀特转向一种更具推测性的方向, 假定复式记账法使财富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崛起成为可能, 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凯恩斯创建的国民核算理论体系的关键先导。由于其强大的历史威力, 目前复式记账法有能力决定 21 世纪“地球的成败”。

本书的前半部分记录了复式记账法创始人——卢卡·帕乔利(1445—1517年)的人生和事业,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帕乔利以其聪明的头脑成为了数学家、魔法师和方济会修士。他利用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出版了几本书, 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本数学百科全书, 其中包含簿记论文, 高度评价了威尼斯复式记账法的优点, 它已成为帕乔利的主要著作。

帕乔利打破传统, 用白话书写

复式记账法论文, 这样所有人都可以读懂, 从而促进了它的使用; 在意大利, 在用印度阿拉伯数字逐渐取代罗马字的过程中, 他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几个世纪之后, 复式记账的遗产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一家股份制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反映帕乔利希望了解“其生意顺利与否”的初衷。一直以来, 复式记账法也对会计标准和原则的发展产生着影响。遗憾的是, 在后面的章节中, 本书出现了炒作的倾向(至少是夸大), 对复式记账法影响的论述言过其实。正如常说的“蝴蝶效应”——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会造成飓风, 人们认为复式记账法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现代决策不完善的根源。即使在福特·平托事件中(1977年, 汽车公司采用以会计为驱动的成本效益分析, 以决定在平托车中安装安全装置), 人们也指责复式记账法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严苛的全球微积分, 创建了一种文化, 使可能的推理产生无情的决策。”会计必定仅仅是一种人类满足其贪欲和展示其无情的工具。

令人非常吃惊的是, 本书还深入展开了有关会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的激烈争论。第7章的标题是“复式记账法和资本主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本章中, 读者可以看到一场客观的辩论, 即是复式记账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还是资本主义促进了复式记账法的发展。不过, 通过短短几个段落, 我们即可以发现作者支持的观点: 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1924年的论文中认为, 复式记账法是引导一种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 即资本主义, 发展的强大工具, 而书中对南非经济学家巴兹尔·雅美的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该参考书目和引文对更加传统的观点, 即会计是社会组织及相关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同样具有倾向性。

同样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他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起源是复式记账法, 这对于熟悉资产负债表和权责发生制的会计人员来说, 更是无法接受。根据凯恩斯的《通论》, 消费加上投资决定总产出, 这一等式必然要达到平衡, 而不是对经济体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和资本予以编制、分类、汇总的账户达到平衡(通过匹配的借方和贷方)。

## 会计必定仅仅是一种人类满足其贪欲和展示其无情的工具。

撇开这些诡辩, 本书无论对会计师还是非会计师来说都不失为一本好书。格里森-怀特设定了轻快的叙述节奏, 并擅长兼顾细节与归纳。她挖掘出了一些有趣的历史资料, 这使得对帕乔利的描述更加生动。例如,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 1509年年末, 由于对其生活方式的担忧, 修道院的修士要求帕乔利被剥夺罗马教皇的信任和一切行政职务时, 他在幕后是如何运筹帷幄的。因为, 就在几个月后, 帕乔利被任命为修道院的院长!

会计如何才能“决定地球的成败”? 格里森-怀特认为, 答案就在于更好地理解资源价值的计量(和非计量)如何塑造全球经济。这一努力是值得的, 同时帕乔利本人肯定也会对此挑战乐此不疲。

克里斯托弗·赫默斯  
(Christopher Hemus)

IMF 财务部副主任



# 追踪财政 规则的运用

## 针对危机的财政遗留问题，数额限制应运而生

IMF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很多国家都通过对赤字、债务、支出或收入实施数额限制，从而实现对关键预算总额的长期约束。这些限制被称作财政规则，有利于控制超支并且因此确保财政责任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在很多经济体公共财政窘迫的情况下，采取财政规则能帮助其在过渡到低赤字的同时提高债务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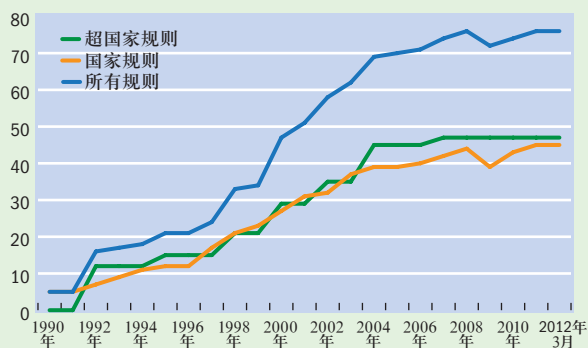
用并加强赤字削减计划。到 2012 年 3 月底，超过 75 个国家在采用国家或超国家的财政规则，而在 1990 年这样做的国家仅有 5 个。

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部分对策，下一代的财政规则正在实施。这些规则旨在平衡可持续性和灵活性的目标，因为可持续性和灵活性目标通常是经济周期波动，即经济增长起伏的原因。此外，财政规则也常常辅之以其他机构安排，比如财政委员会受托监控财政政策和提高财政政策影响的公共意识。IMF 的研究还设计了一个财政规则指数，它概括了国家财政规则的数量及其设计的综合性。国家财政规则指数表明新兴经济体正在迎头赶上发达经济体，并且在危机之后，这两种经济体都推出了新的规则并加强了现有的规则。

然而，下一代的规则似乎更加复杂，这可能对执行、沟通和监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指数衡量的是规则的机构设置而不是实际执行程度。虽然如此，数据集还是为研究人员在未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

1990 年以来，采用财政规则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

(采用财政规则的国家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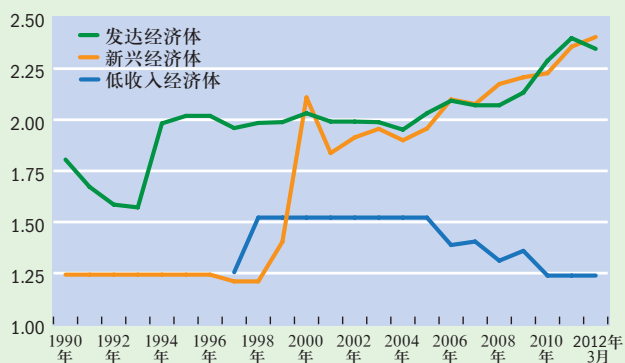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各国当局，以及IMF员工的评估。

注：以2012年3月底有效的财政规则为基础。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新兴经济体在国家规则上已经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

(财政规则指数，0—5)



资料来源：各国当局，以及IMF员工的评估。

注：财政规则指数衡量的是财政规则的数量及其机构设置。高指数表示规则数量更多以及设计更加综合。

### 有关数据的说明

IMF 新编制的数据集包含了从 1985 年到 2012 年 3 月底 81 个国家的国家和超国家数量财政规则。它使人们能够迅速浏览规则的数量和类型的趋势以及规则的主要特征，比如法律基础、执行情况、覆盖范围、例外条款和周期性调整规定。数据集还包含了辅助特征，包括独立的监管机构和财政责任法以及这些规则的逐个国家的详细说明。这些数据可以通过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可视化工具获取，可支持简单的国家间的对比，同时具有 Excel 和 Stata 两种文件格式以方便研究人员的工作。数据集每年更新，该研究本身可以在以下地址找到：[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FiscalRules/map/map.htm](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FiscalRules/map/map.htm)。

本文由 IMF 欧洲部的尼娜·卜迪娜 (Nina Budina) 与 IMF 财政事务部的安德烈·沙赫特 (Andrea Schaechter) 共同撰写。

# 系列研讨会



## 2012·东京

### 年会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集团

# 全球性挑战 全球性对策

2012年10月10—13日，日本东京

2012年的系列年会汇集了全球的金融首领、政策制定者以及顶级专家，共同探讨当前全球经济和发展面临的挑战，尤其关注全球经济、就业与竞争力、欧元区、亚洲的增长、全球卫生、低收入国家的问题、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主权债务风险。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包括:** Nisha Agrawal、Jun Azumi、Sharan Burrow、Gunilla Carlsson、Miguel Castilla、陈冯富珍、Paul Collier、Kwabena Duffuor、Kōichirō Gamba、井上义博、Ellen Johnson Sirleaf、Chanda Kochhar、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李稻葵、大卫·利普顿、Christian Noyer、Peter Orszag、李其、奈梅特·沙菲克、筱原尚之、白川方明、Clare Short、Admassu Tadesse、田中明彦、高西庆、Janet Yellen、朱明。

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worldbank.org/pos](http://www.worldbank.org/pos)

